



真理报

第七期

2025年10月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劳动解放社，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时事评述

- ★ 青年画师“鱼术”事件：文化控制与修正主义社会的自我暴露 1-2
- ★ “光复”的谎言与修正主义的侮辱 3-4
- ★ 论神农架“野人”事件 5-6
- ★ 从马列毛主义视角批判中国对英国的帝国主义行为 7-10
- ★ 中修政权滥用人工智能的政治本质 11-12
- ★ 以“全球妇女峰会”为舞台的意识形态表演 13-14
- ★ 徐州学生抗议：青年觉醒与修正主义教育体制的裂痕 15-16
- ★ 《澎湖海战》：修正主义的电影与帝国主义的梦 17-18
- ★ 民族主义的狂欢与阶级现实的遮蔽 19-20

★ 停火还是重组？——评2025年10月巴以停火的
阶级实质 21-22

★ 习近平清洗何卫东：为对台侵略铺路的政治整
肃 23-25

百家争鸣

★ 坚决反修防变，重建毛泽东式党建路线 26-29

不周山下

★ 我们不会停止斗争，我们要把斗争的旗帜举得
更高——印度辛加雷尼工人联合会声明 30-31

★ 菲律宾共产党班乃地区委员会向牺牲的班乃地区革命
领导人致敬 32-33

历史文献

★ 反克利盖的通告 34-39

导师语录

40



青年画师“鱼术”事件：文化控制与修正主义社会的自我暴露

最近，中国网络舆论出现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位自由画师“鱼术”被家人强行送入所谓“戒网瘾学校”，该校被曝存在非法拘禁、暴力约束与思想灌输。她的求助视频在社交平台短暂流传后即被删除，引起众多网友愤慨。表面上，这似乎是一桩家庭悲剧与教育问题；但从马列毛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我们看到的却是中修社会文化控制机制的又一次自我暴露。

一、修正主义国家的文化机器：从教育到“戒网瘾”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与监狱等强制机构，而文化与教育系统则是思想统治的延伸。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期，教育的目的应是解放人的创造力，发展劳动者的阶级觉悟；但在修正主义国家中，这一职能被彻底颠倒——教育不再是解放，而是驯化。

所谓“戒网瘾学校”，正是这种文化驯化机制的极端表现。它以“教育”“矫正”之名，将青年关进半军事化管理的封闭机构，对思想、行为、身体进行系统控制。这些学校表面上属于社会服务业，实则与警察、宣传、心理健康等部门构成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外围延伸。

在马列毛主义的分析框架中，这样的机构服务的并非人民群众，而是官僚资产阶级维护其社会秩序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把劳动力视为生产资料；而修正主义社会在文化层面上，把青年一代的思想与个性也视为“社会资源”，必须经过“管理”和“驯化”才能“有用”。鱼术事件的关键不在“戒网瘾”是否合法，而在于——国家机器是否有权剥夺一个公民的思想与表达自由。

二、青年创造者的被压抑：个体自由与社会生产的冲突

“鱼术”并非普通学生，而是一名年轻的自由画师。她代表着新时代中大量依靠网络创作、数字劳动生存的青年群体。这部分人既非传统工人，也非资本家，而是处于生产关系夹缝中的新型劳动者——他们依赖平台发布作品，被算法支配劳动节奏，被流量与赞助剥削利润，却又被官方宣传描绘成“自由个体”。

正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无法独立、政治上没有组织、文化上保持一定批判性，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修正主义秩序的潜在威胁。于是，系统性的压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 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把青年创作简化为“兴趣”而非劳动；
- 通过监管与审查，将独立创作的空间挤压到最小；
- 通过家庭结构的“父权”延伸，使家长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鱼术被家人送入戒网瘾学校，不仅是家庭悲剧，更是制度逻辑的体现。家长被灌输“听话即好孩子、自由即堕落”的观念，成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第一环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要依靠说服，而不是压服。”而今修正主义者早已把“说服”变为“惩戒”，把“教育”变为“消灭差异”。

三、修正主义社会的“反叛恐惧症”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青年应当是最具创造力、最敢于批判旧世界的力量。但在修正主义社会中，青年被当作“不稳定因素”，被视为需要“管理”的对象。正如恩维尔·霍查所批判的那样，修正主义国家“害怕青年，因为青年代表未来，而未来不会顺从旧秩序”。

鱼术事件反映出中修社会对“独立人格”的恐惧。一个能够用画笔表达自我、质疑权威、拒绝服从的人，在他们眼里不是艺术家，而是潜在的“危险分子”。“戒网瘾”不过是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让所有年轻人都成为“合格的顺民”。这场事件揭示出当代修正主义统治的深层危机：

一方面，他们需要青年为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经济体系提供廉价劳动力与文化包装；

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青年觉醒、思考、反抗。

于是，他们试图在意识形态上“中性化”青年，让他们“阳光积极但政治冷漠”，让他们“追梦”但不思考“谁剥夺了梦想”。

四、反修正主义的立场：捍卫创造与思想自由

马列毛主义的核心，是解放人的创造力与思想力量。毛泽东曾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鱼术事件不是“个案”，而是一个警钟：当一个国家开始惩罚思想、审查创造、监禁个性时，它已经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必须包括思想与文化领域的解放。

这要求我们：

- 把青年创作者视为劳动者的一部分，组织他们、教育他们，使其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
- 揭露“戒网瘾”“励志教育”产业背后的经济与政治链条，要求彻查这些机构的人身自由问题；
- 呼吁真正的教育改革，让教育回到人民手中，而非服务资本与官僚；
- 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阵线，鼓励青年用艺术揭露社会真相，而非被“净化”与“改造”。

反修正主义并非抽象口号，它意味着要在每一个领域揭露官僚主义与伪社会主义的实质。鱼术事件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称“人民政权”的体制下，人民的孩子仍可能被以“教育”的名义禁锢——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最大讽刺。

五、结语：从个案到阶级斗争

鱼术的遭遇，是被物化的青年一代的缩影。她被剥夺的，不仅是身体自由，更是作为创造者的尊严与主体性。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青年艺术家应当是革命文化的先锋；而在修正主义社会，她却成了“需要治疗的病人”。我们必须让青年明白：真正的病在社会，而不在个体；真正的“网瘾”是资本对人的全面占有，而非青年对自由的爱。

任何打着“治愈”旗号的压迫，都必须被揭穿；任何以“教育”名义的暴力，都必须被反抗。

只有当青年重新掌握思想与创造的权力，当艺术重新成为人民表达的武器，当教育重新为解放服务，修正主义的阴影才会被驱散。

鱼术的画笔，理应画下的是世界的解放，而不是锁链的阴影。



“光复”的谎言与修正主义的侮辱

2025年10月24日，中修政权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自今年起每年10月25日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次日，新华社、央视与外交部齐声宣传，称这是“铭记历史、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日子”。然而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这并非纪念历史的举动，而是一次披着民族外衣的修正主义政治操演，一次对台湾人民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公开侮辱。

一、修正主义的民族主义假面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名义早已被篡夺的中国，统治阶级早已不是工农大众，而是以官僚资本为核心的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以“民族复兴”的话语包装剥削与扩张，以“国家统一”的口号掩盖阶级对立。把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操控的产物。

他们宣称这是“历史正义的纪念”“民族团结的象征”，却避而不谈1945年后的台湾人民经历了怎样的资本剥削、殖民依附与压迫。更不提今日台湾社会的阶级分化与工人被国际资本与岛内资产阶级双重盘剥的现实。

在中修话语中，“光复”被塑造成国家荣耀的延续，实则是修正主义政权把民族主义当作遮羞布，掩盖其对内镇压与对外扩张的双重危机。当社会矛盾激化、群众贫困化、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之时，他们就制造一个“民族大义”的舞台，把阶级矛盾转化为对“分裂势力”的仇恨。这不是“复兴”，而是修正主义体制维稳的毒药。

二、对台湾人民的侮辱

所谓“光复台湾”，在实质上是把台湾当作统治合法性的附庸符号。

他们从未以人民群众的平等地位来理解台湾问题，而是以帝国心态宣布：“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这种叙事抹杀了台湾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存在，把他们降格为被“收复”的对象。

对台湾劳动人民而言，这种“纪念日”不是荣耀，而是侮辱。

它意味着：在他们未曾同意、未曾参与的情况下，一个自称“人民政府”的政权以国家暴力的名义定义他们的历史与未来。

他们以“光复”之名，实际上在否定台湾人民的自主意识、生活经验与阶级斗争权利。

修正主义者宣称“我们是同胞”，但他们对待台湾人民的方式，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态度并无区别。

他们用“民族团结”的词汇，掩盖对台湾社会现实的无知与蔑视；用“祖国怀抱”的比喻，掩盖他们正在准备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吞并。

这不是“兄弟之情”，而是主人与附庸的关系，是压迫者对被统治者的傲慢凝视。



三、纪念政治：为侵略做准备

中修政权的“纪念”从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政治铺垫。

通过立法确立“台湾光复纪念日”，他们试图在法理上固定一种叙事：台湾的主权已由他们代表。

这不仅是历史的偷窃，更是未来战争的舆论预演。

修正主义者口口声声反对帝国主义，却在实践中学习帝国主义的全部手段——

他们在南海建设军事基地；

他们在非洲与东南亚输出资本与监控技术；

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民族情绪，为“正义出兵”寻找合法性。

这种“光复”并非解放，而是吞并；

这种“统一”并非人民自愿，而是国家暴力的延伸。

正如列宁揭露沙文主义时所说：“当统治阶级以民族旗帜遮盖阶级矛盾时，它就成了帝国主义。”

今日中修，以“民族复兴”的口号行帝国扩张之实。

四、反修正主义的立场：人民不需要主子式的“统一”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统一，必须是人民的统一。”

人民的统一，不是靠炮口，不是靠纪念日，而是靠阶级觉悟与平等。

然而修正主义政权的“统一观”正相反：

它不以工农群众为主体，而以国家机器为工具；

它不追求社会平等，而追求政治控制；

它不尊重台湾人民的民主实践，而只要求他们服从。

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根本特征：用社会主义语言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民族情感”掩盖阶级压迫。

今天的“光复纪念”，和昨日的“民族复兴”“中国梦”一样，都是让人民忘却自身被剥削事实的麻醉剂。我们必须揭示真相：台湾问题不是“国与国”的对立，而是两岸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对立。



台湾工人被本地财阀剥削，大陆工人被中修资本压榨——他们的共同敌人不是彼此，而是资本与官僚。

五、人民的立场：两岸工农团结反对修正主义

真正的统一，不在于地图线条，而在于人民心灵的联结与阶级利益的共通。

真正的“光复”，不是把台湾纳入修正主义的统治，而是让两岸劳动人民共同推翻资本与官僚的双重枷锁。

我们呼吁：

- 台湾的青年与工人，不要被“国族威胁”与美帝的假承诺所迷惑；
- 大陆的工人与学生，不要被“爱国主义”的浪潮裹挟；
- 两岸进步力量应在国际主义旗帜下重新汇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修正主义政权与帝国主义阵营。

当修正主义者以“统一”的名义准备侵略时，我们要以人民的名义捍卫和平；

当他们以“光复”的口号侮辱台湾人民时，我们要以阶级的语言揭穿谎言。

六、结语

10月25日不是“光复”的日子，而是修正主义的纪念日。

它象征着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权，已经彻底堕落后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帝国机器。

它象征着统治阶级对台湾人民的蔑视，对历史的篡改，对未来的威胁。

台湾不需要“被光复”，人民不需要“被统一”。

真正的光复，是推翻一切压迫阶级；

真正的统一，是工农大众的联合。

只有当修正主义政权被历史清算，两岸人民才能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纪念日——

那将不是“台湾光复日”，而是人民解放的日子。



论神农架“野人”事件

新一轮的“野人”目击传闻与炒作动向 (2025年)

2025年并未出现确凿的“野人”实证，但这一传说在年内经历了新的炒作与讨论。4月中旬，神农架林区政府区长朱厚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说神农架有野人，是有依据的；说没有，是因为目前尚未找到清晰实拍照片”。他强调当局并非靠“野人”刻意炒作旅游，并援引两千年来关于“毛人”“山鬼”的古籍记载，以及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上百起目击报告来支持野人存在的可能性。朱厚伦提及多次科考发现过未知毛发、粪便、巨型脚印和“竹窝”等迹象，经分析认为属于“介于猿类和人类之间的未知高级灵长类”。尽管如此，迄今没有任何野人实体被拍摄或捕获，所谓毛发DNA检测结果也曾被质疑缺乏定论——一些专家指出历次“野人”目击多半是误认熊或猴，没有化石或尸骸等硬证据支撑野人存在。

年中旅游季，一则招聘启事引发“野人”话题热度。6月，湖北神农架景区在网络发布《全网招聘神农架野人》广告，计划招聘16名“野人”扮演者，日薪500元人民币。招聘要求扮成野人在景区巡游，不得与游客说话，只能发出“呜呜”叫声，且“喜吃生食优先”，甚至鼓励应聘者性格活泼、会拍短视频、脑洞大开。此新奇岗位激起网友好奇，景区通过短视频平台组建了20多个粉丝群，每群500人，总计近万人表达了应聘意向。《新京报》报道称景区将线上筛选和线下面试相结合，最终挑选出合适的“野人演员”。这一事件成为社交媒体热门话题，被戏称为年轻人争当“带薪野人”的热潮。事实上，早在2024年4月神农架景区也曾招聘过“自然观察员”，月薪6000元但附带条件“身体好，遇见野人跑得快”，显示出景区乐于借用“野人”梗来吸引眼球。辽宁本溪、河北邯郸等地景区近年来也推出类似的“野人”或动物扮演岗位，可见旅游业对猎奇元素的炒作已成风潮。

2025年10月，一场意外曝光令“野人”传说再次进入舆论中心。著名民间反拐志愿者“上官正义”10月初在抖音发布视频，揭露湖北神农架林区一些村庄存在长年圈养残障人士为奴的骇人内幕。据披露，多户村民家中非法控制了十几名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长年逼迫其无偿干苦力，有些村民家里竟囚有2至5名残障人士，控制时间长达十年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有被奴役者在囚禁期间遭虐待致死，当地今年5月才开始要求村民将这些人“上交”到福利院安置。部分加害村民坦言，他们早在疫情期就就给这些残障人办过登记、打了疫苗，一直不给工钱，不听话就拳脚相加。某村支书承认他们村曾有20多名残障人被圈养，死了几位却只说是“正常死亡”搪塞。这一曝光引发社交媒体轩然大波，不少网友愤怒质问当地政府为何充当不作为的“保护伞”，任由现代奴隶制在眼皮底下存在。也有网友后知后觉地惊呼：“21世纪还有蓄养奴隶？这是2025年的新闻吗？”



社会舆论、媒体与地方回应

社交媒体上，“野人”传说被网友重新解读。神农架奴役残障者事件曝光后，舆论场上有人将矛头指向流传已久的野人传闻：“怪不得神农架总有人失踪，野人传说估计就是这些村民编出来的”。“可能有残障人逃进深山，偶尔被人瞧见就被误认作‘野人’了”。这种由案件引发的大胆联想在网上广为传播，一时间“野人是人为编造的谎言”成为热门话题。一些评论感叹现实版“白毛女”竟在当代出现：旧社会黄世仁逼死杨白劳、将喜儿虐待至逃入深山变“白毛仙姑”；而今资本的残酷压迫竟将人活生生逼成“野人”，这是一出比神话更令人心痛的社会悲剧。不少网民直言与其耗费精力寻找野人，不如关注现实中残障群体的遭遇。有自媒体撰文称：“野人之谜不在深山，而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矛头直指当地多年暗藏的灰暗角落和监管失职。主流官媒对于此事保持低调，地方政府则试图澄清形象。截至10月下旬，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并未大篇幅报道神农架残障奴役事件，相关讨论多见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以及海外华文媒体的转载。有分析认为，由于事件涉及当地官员失职甚至包庇，敏感度高，导致国内媒体噤声。然而，神农架林区政府并非对“野人”话题全然避讳。正如前述4月发布会上区长朱厚伦所言，地方官方强调“野人”传说并非政府编造的噱头，否认利用野人炒作旅游经济。朱厚伦还罗列了野人传说的历史渊源和科考线索，试图在科学探索与旅游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他的言论经中新网等媒体转载后，一定程度上为神农架正名，缓解了外界对当地“靠野人传说骗游客”的质疑。不过，对于残障奴隶事件本身，除了一些官方术语式的“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表态外，



很难找到更具体的官方回应与问责报道。这种沉默进一步激起舆论的不满，一些网友留言怒批：“真正可怕的不是村民的恶行，而是点赞转发的人那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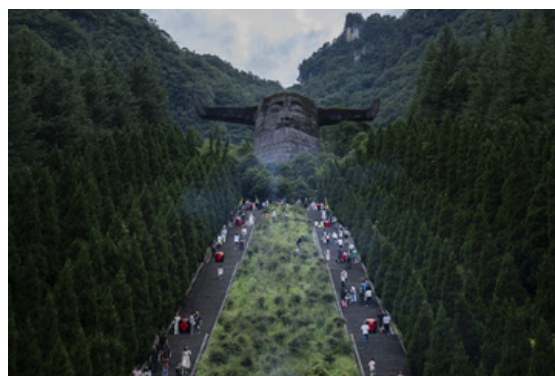
学界和媒体对于“野人”的态度依然分化。一方面，官方科考队伍中不乏坚定的“有野派”人物。例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王善才等专家多年来呼吁重启野人科学考察，声称有“八成把握”证明野人存在。他们强调探索未知的重要价值，把神农架野人比作人类进化“缺环”，发现它将是重大科学突破。另一方面，更多理性声音属于“无野派”。如武汉大学胡鸿兴教授早在1990年代便断言神农架不存在野人，林业部也曾正式宣布未发现野人踪迹。中科院动物所冯祚健研究员直言：“一定要有证据...如果有，为什么找不到？”。经历数十年拉锯，国内媒体对野人话题的论调也趋于谨慎——既不完全否定民间传说的文化意义，又时常提醒公众理性看待所谓发现。例如央视网科教频道曾发表评论：“不要迷恋野人，它只是个传说”。总体来看，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前提下，官方媒体对“野人”采取的是暧昧平衡：既报道科考新发现以吊起读者胃口，又不忘附加质疑以避免陷入伪科学的泥潭。

伪科学、神秘主义与民族主义炒作，以及文旅开发因素“野人”传说在当代中国横跨科学与神秘的灰色地带。支持者提供的所谓证据多停留在“疑似”层面：疑似毛发、脚印、粪便、巢穴。曾有科学家报告某些毛发样本经元素和线粒体DNA分析显示出不同于已知动物、接近人类的特征。然而这些结果既未通过权威刊物发表，也未能重复验证，因而饱受质疑。反之，怀疑论者列举大量反例证明野人目击更像是心理作用或物种误认，使野人研究难脱“伪科学”之嫌。即便如此，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并未放弃野人探秘热情，某些程度上利用了公众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心理。新疆曾有生态学会研讨会上大胆估算“中国可能尚存200~500个野人”，这类惊人言论一度登上媒体头条，实际上也是在迎合神秘主义思潮，为野人话题添了一把火。

民族主义与地方文化自豪感也掺入了“野人”话题的炒作。神农架的“野人之谜”常被与北美“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相提并论，号称“世界四大自然之谜”之一。这一表述频频见于媒体报道和旅游推介，将野人传说包装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传奇符号，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仿佛中国也有不逊于国外的神秘生物传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神农架野人传说”正式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官方专家在论证其文化价值时明确表示：“野人存在的真实性已退居次要地位，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这一地区古老的思维模式”。换言之，政府将野人传说视作宝贵的民俗遗存予以保护和传承，而不深究其科学真伪。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对地方文化的尊重与挖掘，另一方面也被部分批评者视为官方默许神秘主义的表现。马列毛主义者更是抨击道：新中国成立初期致力于破除封建迷信，但改革开放后这些神秘传说反而被当局重新包装成文化卖点，折射出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蜕变。

“野人文化”已成为神农架文旅开发的重要抓手。随着1990年代末天然林全面禁伐，神农架告别砍树打猎的生计，大批居民迁出保护区转向生态旅游。在这一转型背景下，“野人”文化迅速被打造为神农架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当地建立了野人研究馆、野人雕像和主题景点，如“野人洞”“野人谷”等，供游客参观猎奇。每个来到神农架的游客几乎都会被引导了解野人故事，探索神秘传说已成为旅游行程的一部分。官方亦大力推动“野人IP”产业：例如打造野人形象吉祥物“神农小野人”，举办以野人为主体的文创活动和影视作品拍摄。神农架林区“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擦亮神农架野人、金丝猴等天然IP名片”，把野人文化的保护性开发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据《湖北日报》报道，当地正“不遗余力、勇毅前行”地将野人文化资源转化利用，期望“让野人文化带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这种将传说变现的操作在经济层面无疑是成功的——野人之谜作为无形品牌，成了吸引游客探秘神农架的天然广告。但也有批评声音指出，过度营销野人概念可能模糊科普与娱乐的界线，甚至掩盖了神农架真正珍贵的自然生态价值。有学者呼吁应将宣传重点放回到实证的动植物奇观上，而非永远炒作捕风捉影的野人故事。

综上，2025年10月前后的神农架“野人”事件，既包含一起震惊社会的奴役残障人士丑闻引发的舆论风暴，也折射出地方多年围绕野人传说进行的文化旅游运作。一方面，野人传说被证明可能是残酷现实的遮羞布，令人大梦初醒；另一方面，在资本和官方话语下，野人又被塑造成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工具。从马列毛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关于“野人”的纷争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素材：当资本逐利与封建迷信交织，神话可以变成生意，甚至成为掩盖社会伤痕的面具。这些事实与讨论将有助于进一步剖析当代社会的矛盾根源，为撰写一篇立场鲜明的政治评论文章提供扎实依据。



从马列毛主义视角批判中国对英国的帝国主义行为

事件背景与外交动因

2025年10月，中国与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外交风波，其导火索是围绕中国计划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的争端以及英国对中国企业实施的制裁措施。当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领导的政府再次推迟批准中国在伦敦建造欧洲最大规模大使馆的规划申请。这一项目早在2018年中国政府就耗资购买了伦敦塔附近的皇家铸币厂旧址，但在2022年遭到当地政府以安全和民意为由的否决。三年来，英国当地居民、议会议员以及旅英港人群体持续反对这一“大使馆”计划，担心如此庞大的设施可能成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基地。中方对此一直不满，甚至早在2024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与斯塔莫的通话中直接提出此事，促使斯塔莫政府越过地方权限，将大使馆审批权收归中央政府手中。然而，由于英国国内对中国间谍案处理不力引发政治压力，加之对该项目保密设计的审查，英国住房部多次延后最终裁决日期，最新期限顺延至2025年12月。

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上的中英矛盾也在升级。2025年10月中旬，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1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清单，理由是它们涉嫌与俄罗斯能源、金融和防务部门有往来，从而间接支持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一举措引发北京的强烈抗议。中国指责英国此举是“单边制裁”，既无国际法依据也未经联合国授权。中方外交和经贸官员多次向英方提出交涉，但斯塔莫政府顶住压力，如期在10月15日执行了制裁决定。因此，在大使馆项目受阻和企业制裁这双重因素作用下，中英关系在10月迅速恶化，并最终导致中国政府高调放话，向英国方面发出带有威胁意味的警告。

中国对英国的“威胁”语言和行为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政府公开对英国使用了异常强硬的措辞和姿态，表现出赤裸裸的外交霸凌。针对伦敦大使馆项目审批再次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025年10月17日的记者会上表达了“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指责英方“无视契约精神，背信失义”。中方发言人林某警告称，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否则英方须承担一切后果”。“须承担一切后果”的措辞在外交辞令中极为罕见，等同于向英国政府发出了公开威胁。北京方面的强硬立场无异于在说：如果英国不让步，中方将采取报复行动，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英方自负。这种咄咄逼人的语言，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也令英国朝野震惊。



同样，在英国宣布制裁中国企业的问题上，北京展现出强烈的反击姿态。中国商务部于10月下旬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英方对11家中资企业的制裁。声明强调中方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并“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相关中国实体的制裁”。这种措辞意在表明，如果伦敦不撤回制裁决定，北京可能采取相应措施“维护权益”，暗含以牙还牙的意味。实际上，这种表态与其说是呼吁，不如说是威逼：要求英国“纠正”行为，否则中国将进行报复。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英国的贸易和投资影响力，这番话无疑在向英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这与近年来中国外交风格的总体转变一脉相承——即所谓“战狼外交”的盛行：对外动辄使用威胁性语言，试图以强硬姿态压服他国就范。

英国方面对此类威胁并未屈服。斯塔莫首相公开回应称，他不会被中国“牵着鼻子走”，英国对新大使馆项目的决策会按照法律和正当程序进行。首相发言人也强调，大使馆审批是“准司法的独立决定”，政府“不承认任何所谓承诺或保证”——意即不会因为中方压力而预先答应通过项目。英国住房大臣的再次延期裁决，更体现出英方有意放缓节奏、不让中方牵制决策的立场。可以说，中国的威胁话音刚落，英国政府就表明不会买账。这场围绕大使馆的对峙，使得中英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充分暴露了中国当局在对外关系中日趋强硬乃至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行径。

帝国主义扩张本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要深入理解中国政府此番对英国咄咄逼人的背后动因，必须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高度揭示其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扩张本质。列宁早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占据统治地位、金融资本与国家政权高度融合的阶段，便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包括：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形成巨型垄断企业和财团、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居于突出地位、列强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以及殖民体系或新殖民形式的形成。国家政权不再扮演中立裁判，而是直接服务于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强化对内对外的剥削和扩张。

以此马克思主义定义来对照，中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特征无疑已经深刻地打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烙印。首先，从经济基础看，当代中国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而是一个由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庞大经济体。中国国内拥有一批规模空前的垄断企业——既包括像中石油、中移动、中铁建等控制能源、电信、基建命脉的国有垄断巨头，也包括如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国内外市场举足轻重的超级垄断私人企业。这些资本寡头与中共政权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和政治的走向。这正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其本质与历史上的老牌帝国主义并无二致：

垄断、寡头统治以及对内对外的扩张盈利。正如毛主义者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分析，那种“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曾是苏修称霸的基础，如今亦成为中共当局对外称雄的经济基石。

其次，从对外行为看，中国正在全面展开典型的帝国主义式对外扩张。在经济上，中国通过大规模资本输出来谋求全球影响力。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一战略的集中体现。十余年来，中国利用国家资本和政策性银行，向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投入了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贷款和投资，用于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到2020年代中期，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国，对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贷款余额居于首位。这种投资输出表面披着“互利共赢”的外衣，实际上往往附带高额利息和严苛条款，使受援国背负沉重债务。斯里兰卡就是前车之鉴：由于无力偿还贷款，其战略要地汉班托塔港被迫以99年长租形式交予中资企业控股经营。这与19世纪帝国主义通过债务控制小国、攫取殖民港口的伎俩如出一辙，被许多国际观察家直斥为“债务陷阱外交”。

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中国也日益表现出争夺地区乃至全球主导权的雄心。中国近年来强化军事力量建设，拥有全球第二高的军费开支，不断扩充海军远洋能力，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设立军事基地，并首次在非洲吉布提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为保护其海外利益提供武力后盾。这些举措标志着中国正摆脱以往奉行的“不结盟、不争霸”外交，转而积极谋求区域霸权地位。可以说，中国正在从过去被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形象，蜕变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正如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等革命组织的研究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是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被压迫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敌人。它口头上继续标榜“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奉行的是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扩张争霸的资本主义帝国路线。这一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走上了与美欧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相竞争、瓜分世界的道路。

毛后中国修正主义演变：从革命到反动

要揭露中国当局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必须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修正主义发展脉络和阶级路线转变。1976年毛主席病逝后，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迅速落入以华国锋、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手中。当年10月，华国锋发动政变，逮捕了毛泽东路线的坚持者“四人帮”，从而终结了持续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反革命政变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被颠覆，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夺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正如毛泽东生前所警示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1976年的党内政变证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权，资产阶级开始在中国当家做主。

1978年底，邓小平利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上台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这场由修正主义者主导的改革迅速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城市国营企业开始走向市场化；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被摒弃，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国家大力引入外资和私营经济，承认资本雇佣劳动的合法性，把追求GDP增长和利润作为首要目标。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

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私有资本迅速膨胀，两极分化急剧拉大，新兴资产阶级（其中相当部分由中共官员及其家属转化而来）富甲一方，而工人农民则重新沦为被剥削阶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更加剧了这种资本主义化趋势。2002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甚至公开允许资本家入党，赤裸裸地宣告中共已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而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利益。此举在思想上、组织上完成了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进程。



回顾这条演变路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逝世后发生了一条两条路线斗争的逆转，革命路线被反革命路线取代。以华国锋、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权之后，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一步步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培养壮大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阶层。毛泽东时代所坚持的自力更生、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理论，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拜倒在西方资本和市场规律脚下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肢解瓦解为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资本共



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被不断边缘化，直至完全丧失领导权。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已经完成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社会法西斯专政国家的蜕变：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中共名义行使），经济上奉行垄断资本主义，对内镇压工人、农民和一切不满力量，对外积极融入乃至争夺资本帝国版图。

这一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地表明：中国今日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阶级根源，就在于1976年后的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正是由于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中国内部坐大，他们才需要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输出过剩资本、攫取海外超额利润。

历史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就是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今天的中国亦步其后尘。当今中共当局高喊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其真实含义就是要跻身帝国主义强权俱乐部，参与对世界劳动人民的压榨和剥削。这不仅彻底背离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帝反修的路线，也是对中国几代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成果的背叛。简而言之，中国已经从昔日的反帝先锋蜕变为今日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

外交霸凌对主权与人民尊严的侵犯

以习近平当局此次对英国的粗暴威胁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帝国主义是如何践踏别国主权、侮辱别国人民尊严的。英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有自己完整的法律程序和民主机制来决定本国事务。然而中国政府却公然要求英国“履行义务”、服从中国的意志，通过威胁手段企图强行干预英国的内部决策。这种做法无疑是对英国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何谓主权？主权意味着一国有权依照本国法律和民意自主处理内政外交，不受外来强制。而北京方面动辄以经济报复或外交施压相威胁，要英国政府在大使馆选址、安全审查等问题上听从中方要求，实际上就是不把英国的自主决策权放在眼里，把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视作自己势力范围内可以摆布的对象。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带有典型的帝国主义傲慢。

不仅如此，中国的外交霸凌也是对英国人民尊严的公然侮辱。伦敦“超级大使馆”项目之所以受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民众和各界对中共政权人权纪录和间谍活动的不信任。英国东伦敦塔村当地居民通过正当民主程序，表达了反对在自家社区引入这样一个庞大而可能带来安全风险的外国设施的意见，并由民选的地方议会据此否决了规划申请。这是英国人民捍卫自身社区安全和尊严的正当行为。然而中共当局对此却大为光火，试图通过高层施压手段绕过基层民意。习近平甚至直接要求斯塔莫“介入”此事——这等于要英国首相无视本国基层民主决策，为讨好北京而强推项目。如此蔑视英国人民意愿和尊严的要求，本身就充满了帝国主义者对待“小国人民”时的傲慢心态。当英国政府未能如其所愿加速批准时，北京立即扣帽子说英方“背信弃义”，仿佛英国理所应当履行对中国的某种“契约义务”。可是英国政府发言人明确表示并不存在任何此类承诺——中方所谓“履行义务”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试图强加己意给英国。这无疑也是对英国人民集体理性的侮辱，仿佛英国必须对中国唯命是从，连自己的安全和法律标准都要让步。这种做法激起了英国朝野的反感，也伤害了英国人民的民族尊严。



历史地看，中国人民曾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对主权被侵害、尊严被践踏的苦痛有切身感受。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中国执政集团在对外交往中却采取了和当年列强类似的霸道作风。他们口口声声强调本国主权不容干涉（例如在香港、新疆、人权等议题上拒绝他国批评），可是一旦涉及自己的对外利益，却毫不犹豫地干涉别国内政、威逼他国就范。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其真实信条并非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和弱肉强食逻辑。中国外交官过去几年多次上演辱骂他国记者、威胁他国政府的场景，从对澳大利亚提出“十四点要求”到对立陶宛进行经贸报复，手段与旧殖民主义者何其相似！此次对英国人民的欺压更是开创了北京对欧洲主要国家直接恐吓的先例。对此，英国人民当然不会接受；正如斯塔莫政府所言，他们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通过法治程序处理大使馆争议，而不会听命于外国的恐吓。英国社会各界对此也提高了警惕，许多议员和民众更清楚地认识到中修政权的霸道本性，主张对其采取更强硬的防范政策。这一系列反应表明，中国当局对英国的外交霸凌，不仅是对英国国家主权和人民尊严的冒犯，也在客观上促使英国乃至更多国家人民更加团结地对抗来自中国的新威胁。

国际主义的呼吁：团结抵制新帝国主义霸权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自我标榜“社会主义大国”却行帝国主义之实的新霸权，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有责任发出国际主义的呼声：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抵制一切形式的新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不论旧的新的都是当今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列宁曾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仍是时代主题，帝国主义就是在走向灭亡的垂死资本主义，但在覆灭前会做最疯狂的挣扎。毛泽东也告诫我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除非被人民推翻。今天，美帝国主义依然是全球头号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主要对手（如中国、俄罗斯）就自动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恰恰相反，无产阶级革命者决不能因为某些国家曾经有过红旗，而放任其蜕变成新的帝国主义强权。中国与美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阶级立场区别，它们之间的冲突只是一山不容二虎的强盗之争，没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英国工人阶级不应天真地认为可以利用中国来抗衡美国霸权；中国工人阶级更应认清，本国统治集团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所进行的扩张，同样是在损害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甚至包括中国劳动人民自己的长远利益。

因此，我们号召全球范围内的新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一切进步力量，重新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对抗新帝国主义的威胁。具体而言：

-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论对手是旧帝国主义还是新兴帝国主义，我们都应与受压迫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而非站在本国或他国资产阶级一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行径。
- 加强人民间的团结合作：各国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应超越民族偏见，交流彼此反帝斗争的经验，相互声援。英国人民反对中国大使馆霸凌的正义行动，值得世界人民声援；同样，中国国内的工人和进步人士如果起来反对本国资本-官僚阶级的专制和掠夺，也需要国际支持。
- 揭穿修正主义的欺骗：对于打着“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家”旗号行帝国主义实质的行为，要提高警惕并予以揭露。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指出，中共现行政策早已背叛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路线，其对外扩张与对内镇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新生产资产阶级统治的体现。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防止工人运动中出现对中国当局的幻想和绥靖情绪。
- 准备新的世界革命：归根结底，帝国主义的完全终结只有靠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实现。正如革命同志所总结的：“只有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才能从地球上永久地消灭。”我们必须把反对包括中国帝国主义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纳入新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议程。只有通过一场国家内部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并最终联结成全球性的革命风暴，才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世界。

总之，中国对英国的帝国主义霸凌行为，再次提醒了世界人民：帝国主义没有颜色区分，无论是打着米字旗、星条旗，还是五星红旗，只要干的是压迫和剥削别国人民的勾当，就必须受到革命的批判和抵制。让我们以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武器，认清中共修正主义集团的帝国主义真面目，揭露其欺骗性和危害性。让我们团结一切遭受旧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民族，互相支援、并肩战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当全世界人民都奋起反对一切帝国主义霸权的时候，就是所有帝国主义走向灭亡之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那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沿着这一革命路线坚定前进，我们才能迎来帝国主义彻底崩溃、人民真正解放的明天。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中修政权滥用人工智能的政治本质

2025年10月7日，OpenAI发布《公共威胁报告》（Public Threat Report），披露多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的ChatGPT账户因违反安全政策被永久封禁。CNN与《德国之声》等国际媒体随后报道：这些账户曾利用ChatGPT协助设计大规模监控系统与社交媒体监听工具，并生成用于政治宣传与社会控制的材料。

OpenAI首席调查员Ben Nimmo指出：“中国并非首次监控公民，但他们认为AI能让这一体系更高效。”

这一事件，揭示了中修政权在数字时代的本质——把人工智能变成巩固统治的机器化暴力手段。

一、AI滥用：数字化镇压的新阶段

根据报告，涉事账户曾要求ChatGPT生成分析维吾尔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出行轨迹、警务记录的方案；另有用户请AI撰写扫描X（前推特）、Facebook等平台的“舆情监控系统”草案，用于识别所谓“高风险人员”和“极端言论”。

这些内容并非单纯的技术探索，而是对群众思想与行为的系统性追踪与分类。

在马列毛主义的视角下，任何技术都不是中立的。技术掌握在谁手中、服务于哪一阶级，就决定了它的性质。AI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能够减轻劳动强度、推动社会进步；但当它掌握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便成为新的剥削与镇压工具。

今天的“数字中国”正是如此：人工智能被纳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机器，与公安系统、网信办、宣传口融为一体。

算法代替了群众路线，大数据取代了社会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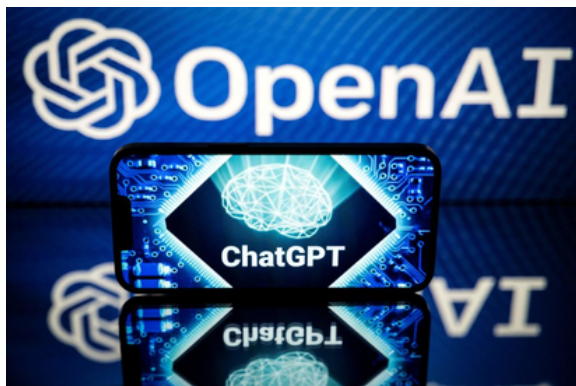
正如毛泽东所警告的那样：“脱离群众的技术进步，只会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

AI技术被修正主义者利用后，成为一座冷冰冰的高塔——它不再生产知识，而是生产服从。

二、虚假的“AI自主”与国家垄断资本

封禁事件曝光后，中国驻美使馆辩称：“中方反对毫无根据的抹黑，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AI治理体系，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这番话看似稳重，实则自曝其心：他们并不否认监控，只是强调要“在党领导下”进行。



所谓“AI自主可控”，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新神话。

所有AI基础设施——从数据中心到算法框架——都掌握在国企寡头、军工集团、网络巨头手中。

AI的“自主”，并非人民掌握技术，而是国家垄断资本集中科技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这种模式下，劳动群众的生活数据被榨取为统治原料：

- 出行、通信、消费、社交全被纳入“治理模型”；
- 工人和农民的劳动轨迹被用于劳动力预测和管控；
- 少数民族和信仰群体的活动被当作“安全数据”。

人工智能由此成为国家机器的神经系统。它让监控更精确，让镇压更自动。

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的自然延伸：机器不再解放人，而是解放统治者。

三、修正主义的“数字帝国主义”

OpenAI报告同时指出，这些中修账户还用于对外舆论与信息行动：自动生成宣传内容，模拟外国网民语气进行政治引导。

这标志着中修政权的统治逻辑已从国内高压扩展到国际舞台，形成数字帝国主义的雏形。

在列宁的意义上，帝国主义是资本输出与垄断的结合；在当今时代，数据即资本，算法即垄断。

中修政权以“数字丝绸之路”为名，将AI与网络技术输出至亚非拉国家，实质是输出监控体系与审查模式。

他们宣称提供“治理经验”“数字合作”，实际上是向外扩张其意识形态控制结构——这是修正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外衣。

这与美帝国主义的网路霸权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披上“东方和平”与“共赢发展”的词藻。

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在数字领域的合流，意味着资本全球体系的又一次再整合：

西方控制金融与专利，中修控制数据与生产链；二者都以压迫劳动人民为代价。



四、技术掩盖的阶级斗争

OpenAI的调查结论指出，这些国家行为体“更多是利用AI完善现有监控机制，而非创造新型攻击方式”。

这句话道出了核心：他们没有创新能力，只有控制欲望。

修正主义政权的科技政策并非解放生产力，而是让旧的官僚机器更高效、更冷酷。

AI成为“数字政工干部”，在高校、企业和军队中承担思想审查任务。

AI写的“学习心得”“思想汇报”成了官僚主义的新产物——形式主义数字化、虚伪忠诚自动化。

科技并没有带来真理，只带来了更快的谎言。

列宁指出：“机器不属于谁，它就为谁工作。”

如今，AI属于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它便为他们服务。

这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政治控制与资本积累合为一体。

五、我们的立场：让技术回到人民手中

面对AI的滥用，工人阶级与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提出自己的答案：

- 1.揭露技术的阶级属性。任何宣称“中立”的AI，若建立在劳动者被监控与数据剥削之上，本质上都是压迫工具。
- 2.要求技术民主化。数据应属于人民；算法必须公开；模型权重不能成为国家与资本的私产。
- 3.建设无产阶级的AI实践。利用AI帮助工人组织、调查劳动条件、揭露剥削真相，而不是为统治服务。
- 4.开展思想斗争。反对“技术决定论”的迷信，反对“数字乌托邦”的幻觉，坚持毛泽东所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真正的社会主义人工智能，必然建立在群众监督与集体所有的基础上。

唯有如此，科技才能从资本与官僚的手中被夺回，成为解放的工具。

六、结语

OpenAI的封禁事件不是偶然，而是修正主义制度走向技术极权的必然结果。

AI滥用揭露了中修国家的真实面目：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披着红旗的垄断资本主义政权。

它以算法取代思想，以监控取代政治，以数据取代群众路线。

当技术被剥夺为权力工具时，唯一的出路是革命。

我们必须让机器重新为人民服务，让算法服从工人阶级的利益。

只有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类解放的力量。

以“全球妇女峰会”为舞台的意识形态表演

一、事件与话语：舞台、台词与灯光

2025年10月13-14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全球妇女峰会（Global Leaders' Meeting on Women），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合作主办；现场来宾“来自110余个国家”，会后发布《主席声明》；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弘扬北京世妇会精神 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围绕纪念1995年北京世妇会30周年、性别平等与“共同体”叙事作政治铺陈。官方报道与实录确认了上述全部要点。英语权威通稿同样指认：Xi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delivered a keynote；会期两天，定位“推动妇女全面发展与治理”。

路透的会场侧记补充：习近平强调“提高妇女参政比例、把性别平等根植于社会”，并在国际场合将其与国家发展、人口老龄化等议程相连。

与此同时，《卫报》点出尖锐反差：在北京颂扬“妇女进步”的同一天，中国境内的女权行动与公民社会长期遭到系统性压制；知名倡议者被噤声或流亡，线上性别议题屡遭删帖限流，国家却借峰会外交场合宣称“成绩”。

小结：事实层面——确有其会、确有其人、确有其旨；意识形态层面——官方把“北京世妇会精神”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叙事里，塑造成政治合法性的符号资本。

二、从马列毛主义出发：谁在“代表”妇女？

列宁在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时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非超阶级的“全民机关”。当代中国在经济基础上呈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征，政—资—军高度融合；在上层建筑上则以新官僚资产阶级掌握话语生产与资源配置。把这一框架投向“女权”领域，可见峰会表演的三层功能：

1. 外宣装置：通过与UN Women并置舞台、借纪念“北京+30”的全球记忆，把国内治理叙事外包装为“全球公共品”。《主席声明》中的关键词——“反歧视、反暴力、关注弱势、平台合作”——是普适语词，却被嵌入主办方总结口径并由中方“概括共识”的形式呈现。
2. 内宣工具：人民日报与国办系统通稿齐声强调“为全球治理指明方向”“中国方案”“五项务实举措”等，借“妇女议题”反向证明政治中心与执政合法性。
3. 遮蔽机制：当下国内组织化的女权行动与社群空间被压缩，与会场上的华丽辞藻构成“双重现实”。



在阶级分析上，谁在代表妇女？并非广大女工、农妇与底层服务业劳动者在代表自己，而是国家-资本复合体及其文化机器在替她们代言；这恰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路径：保留“平等”“赋权”的词汇外壳，抽走其阶级内容与群众路线，最终把“妇女事业”转化为国家品牌工程与资本友好议程。

三、点名批评“中修式女权”的主要派系

说明：下列派系并非女权理论学科分类，而是结合中国当下政治—舆论结构的实践形态；彼此可能交叉重叠，但在功能上共同服务于现存秩序。

1) “官办女权”（体制派/会议派）

表现：以全国妇联系统与政务媒体为枢纽，突出“巾帼建功”“半边天”表述，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参与现代化”。峰会报道中反复出现“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把倡议转化为行动”的措辞，正是此派的典型修辞学。

问题：将“妇女”定位为国家战略资源（生育率、老龄化、基层治理），而非具有独立主体性的劳动者；把“参与”限定在体制授权的空间，去政治化群众斗争与工会化组织。

2) “消费主义女权”（市场派/品牌派）

表现：把“女性赋权”转译为消费能力与职业形象：“她经济”“女企业家峰会”“职场进阶学”等，通过平台与品牌制造“向上流动”的符号。

问题：个体化地讲“成功学”，消解结构性不平等（用人歧视、同工不同酬、带薪育儿/托育缺位、流水线苛责与性骚扰申诉无门等）；最终把女性身体与情感商品化，为资本赢取“好看”的ESG叙事。

3) “自由小资女权”（沙龙派/评论派）

表现：聚焦教育与城市白领议题，热衷“公共说理”，回避组织化劳动争议与与权力直接对抗。

问题：将压迫解释为文化偏见与“旧观念”，忽略生产关系与国家机器；在现实高压与审查中趋于“安全议题”，对女工、农妇与新兴零工平台女性劳动者的困境缺席。

4) “纪录-慈善化女权”（项目派/NGO化）

表现：通过项目、报告、公益短片呈现个案不公，争取政策微调。

问题：去阶级化与去斗争化的治理同化路径——将系统性问题化约为“改进执行”“增加资源”，不触及所有制结构与权力配置。

四派合流的结果：把“妇女解放”从阶级斗争抽空，变成国家与市场联手管理女性人口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治理课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修式女权”。

四、数据与反差：话术的“繁荣”与现实的“缝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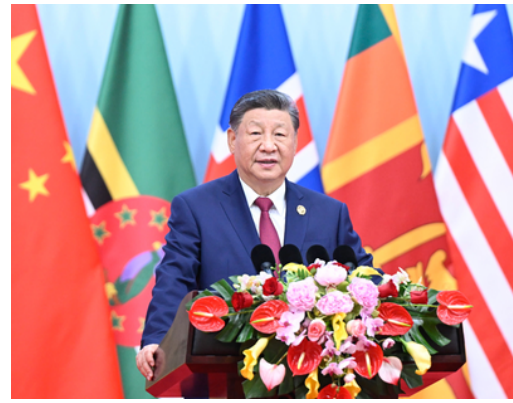
1. 峰会宣示“推进平等、反对歧视与暴力”，并以“北京+30”作为正当性资源；官方稿件与《主席声明》均如此表述。

2. 但国际与独立媒体的长期观察显示：在国内，女权行动空间被系统收缩；议题从生育自主到反家暴、从高校性骚扰申诉到平台女骑手劳动权，常遭审查、打压与边缘化。《卫报》此次点名这种“会场繁荣—社会收缩”的并置。

3. UN体系在“北京+30”前后的评估同样提醒：全球性别平等倒退风险上升，女性权利在多国遭回潮，需要制度性投入与可验证的执行，而非空洞口号。

五、我们的立场与路线：把“妇女解放”还给工农妇女
马列毛主义不把“妇女问题”视为“文化偏见问题”或“话术竞争问题”，而是生产关系与阶级统治在再生产领域、家庭领域与劳动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因此：

- 阶级立场：真正的妇女解放，必须以工农妇女为主体，以组织化的阶级斗争为路径；不是在权贵会议的聚光灯下辩美辞令，而是在车间—平台—社区中建立女工互助、反骚扰与集体谈判机制。
- 路线主张：
 - a. 重建群众路线：支持女工在工会/工人互助组织中的独立发声与领导权；
 - b. 制度性保障：同工同酬、反孕产歧视、带薪产检与托育、反家暴强制报告与庇护网络、对平台企业的算法透明与最低报酬保障；
 - c. 政治空间：反对以“稳定”为名的组织化权利打压，承认女权行动与工人运动的结盟权；
 - d. 意识形态斗争：揭穿“官办/消费/小资/项目化女权”的中修话术，反对把“妇女”降格为生育率工具与治理对象。



六、对这场峰会的结论性判断

1. 它是真实发生的国际会议，时间、地点、与会层级与讲话要点均已确认。
2. 它在政治上是一次象征性动员：把“北京+30”的国际记忆与“共同体/中国方案”绑定，以“妇女发展”包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治理正当性。
3. 它遮蔽了国内现实矛盾：峰会舞台上“进步”的叙述，与对国内女权行动的长期收缩并置成结构性反差。

因此，从马列毛主义与强硬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我们的判断是：

这场十月的妇女峰会，是中修政权对“女权”的又一次符号占有与去阶级化操作。我们必须把“妇女解放”的话语权还给工农妇女——在生产与再生产的现场、在组织与斗争的实践中，而不是在豪华会场的掌声里。

徐州学生抗议：青年觉醒与修正主义教育体制的裂痕

2025年10月15日，江苏徐州铜山区铜北中学数百名学生爆发罢课抗议，矛头直指学校引入的外包教育机构“全人教育”。学生们集体高喊“退钱”，要求撤销该机构、惩处辱骂学生的“项目校长”。次日，抗议蔓延至上级学校郑集中学，学生自发组织集会，迫使校方最终妥协，解雇涉事人员。

在表面上，这起事件似乎只是地方学校管理混乱的教育纠纷；但在更深的社会层面，它揭露了中修教育体制的阶级本质：一个早已被资本私有化、被修正主义官僚化的教育体系，正在把青少年推向对立面。徐州学生的呐喊，不仅是对教育不公的抗议，更是对整个修正主义社会秩序的一次历史性控诉。

一、教育商品化的根源：修正主义对青年的掠夺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是培养工农接班人、提高阶级觉悟的事业；而在修正主义国家，教育被改造成了利润机器与政治工具。

所谓“全人教育”项目，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外包模式。地方政府与学校为追求“升学率”和“管理创新”，把课堂交给商业公司，用口号包装、用指标驱动。教师被迫服从企业化运作，学生被迫接受“思维导图”“导流课堂”等花哨形式主义，而背后是一整套以资本逻辑取代教育目的的制度。

教育不再是人民的事业，而是市场的猎场。

“全人教育”收取高额培训费，学校从中抽成，教育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教师成为被压榨的廉价劳动力，学生成为商品的消费者，家长则被当作“投资者”。

这正是修正主义社会的典型症候——社会主义名义下的资本统治。

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警告：

“我们的教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而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

今天，修正主义的教育体系恰恰背叛了这一根本原则。它披着“为人民”“为孩子未来”的外衣，实则服务于资本积累与官僚升迁。



二、学生抗议的意义：青年阶级意识的萌芽

徐州铜北中学的学生们并非政治活动家，他们只是被压迫的青少年。

然而，他们的行动却具有深刻的阶级意义。

当一个项目校长当众侮辱学生——“你们考不上本科”——学生们第一次意识到：教育不再是他们成长的阶梯，而是侮辱与剥削他们的工具。

当他们罢课、集体聚集在操场上喊出“退钱”的口号时，他们实际上喊出了更深的命题——我们拒绝被欺骗、被剥削、被物化。

这场抗议虽然以学费与管理为导火索，却在客观上成为青年阶级觉醒的标志。

学生不再相信学校官僚、教育口号和制度承诺，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抵抗。

这正是列宁所说的：“革命并非从理论教科书中产生，而是从群众反抗现实压迫的自发行动中产生。”

徐州学生的行动，尽管规模有限、诉求具体，却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在被资本压迫下觉醒的可能性。

他们不再畏惧校长、教师、政教主任这些体制代理人；他们在集体行动中找到了力量与尊严。

三、修正主义教育体制的腐烂

修正主义的教育体制之所以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它的阶级属性已经彻底变质。

(1) 政治上：教育成为控制工具

学校被迫承担“思想安全”职能。教师被要求“管思想、保稳定”，学生被要求“听话守纪”。政治学习被简化为背诵口号，而真正的思想讨论被压制。

教育沦为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稳定的温和警察。

(2) 经济上：教育成为资本积累手段

学费、培训、课外辅导、校企合作、教育地产——资本通过教育链条攫取巨额利润。

修正主义官僚与资本联姻，共同形成新的垄断集团。

徐州的“全人教育”不过是全国无数类似项目的一个缩影。

(3) 文化上：教育成为灵魂麻醉剂

学生被灌输竞争、服从、功利、犬儒的思想。

他们被训练成“合格的工具人”，而非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

学校墙上挂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标语，实际上培养的是顺民与雇佣兵。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的反抗本身就成了是一种“政治错误”。

他们一旦觉醒，便会遭遇恐吓、劝退、处分。

但正是这种压迫，催生了新的革命种子。

四、青年反抗的阶级化：从学生到劳动者的统一战线
我们必须看到，学生并非孤立群体。

今天的学生，是明天的工人、技术员、程序员、教师、外卖员——他们的命运最终都将归入被剥削阶级。

修正主义政权最害怕的，就是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正如19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初期，青年一旦与劳动人民结合，便能形成真正的社会爆炸力。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青年最有朝气，最富创造性，最有革命的勇气。”

因此，我们必须从徐州事件中看到潜在的路线：

- 让学生认识到他们所受的压迫，与工人阶级被剥削是同一根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让教师明白，他们也是被体制压榨的劳动者，而非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 让青年团体、独立学社、左翼小组重新组织起来，把“教育抗议”转化为“阶级斗争的学校”。

只有这样，青年运动才能突破校园围墙，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

五、反修正主义的立场：教育必须回到人民手中

反修正主义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对现实制度的根本否定。

我们必须明确：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不是“有缺陷的社会主义”，而是服务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精神工厂。

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 所有权属于人民——教育资源不应被资本和官僚控制；
2. 方向服务阶级解放——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革命者，而非考试机器；
3. 群众监督教育——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管理，而非服从命令。

我们主张：

- 废除教育外包和“企业化学校”；
- 建立学生自治会与教师委员会，共同监督校务；
- 保障青年言论与集会权，防止政治报复；
- 把教育经费用于公共服务而非资本项目。

当学生喊出“退钱”的那一刻，他们实际上喊出了：“把教育还给人民！”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口号。

六、结语：裂缝正在扩大

徐州学生的抗议，也许会被当局掩盖、被舆论降温，但历史不会遗忘这一幕。

它让人们看到：哪怕在修正主义统治的钢铁高墙下，青年仍有勇气站起来说“不”。

这场罢课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修正主义教育体系裂缝的象征。



正如列宁所言：“当被压迫者不愿再被压迫时，革命就开始了。”

当学生敢于质疑校长、敢于对抗官僚、敢于追问“教育的意义”时，他们已经跨出了觉醒的第一步。

这正是我们的任务：

要让这场抗议不被湮灭，而成为火种；

要让徐州的声音，传向全国的校园、工厂与社区；

要让青年明白——真正的教育，不是服从与考试，而是斗争与解放。

徐州的学生已经点燃了火炬，修正主义的教育王国终将被熊熊烈焰吞噬。



《澎湖海战》：修正主义的电影与帝国主义的梦

2025年10月25日，中国大陆在所谓“台湾光复纪念日”当天发布历史大片《澎湖海战》的正式预告片。这部影片讲述17世纪清朝将领施琅征讨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的故事，标榜为“再现祖国统一的历史壮举”，由中宣部重点扶持、国企资本投资。影片发布时机刻意与“光复纪念日”重合，标语写得极其直白——“统一台湾，势不可挡”。

从艺术形式看，它是一部战争片；从政治性质看，它是一份宣言书。它不是艺术的胜利，而是修正主义国家机器在文化领域发动的一场意识形态攻势，旨在以影像重塑“统一台湾”的历史正当性，强化民族主义狂热，掩盖阶级矛盾，为未来的军事行动与国家扩张铺路。

一、电影不是艺术，而是政治

列宁在论述电影时指出：“在文盲的国家，电影将是最重要的艺术。”这句话在今天依然真实，只是方向被彻底反转——在修正主义国家，电影不再是启蒙工具，而是政治催眠。

《澎湖海战》的叙事选择并非偶然。它以清朝“收复台湾”为主题，将封建王朝的征服战争包装为“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历史被篡改政治寓言：施琅成了“民族英雄”，郑克塽成了“割据势力”。这种改写不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可投射至当下的意识形态模型：

“统一即正义，反抗即叛乱。”

这就是修正主义文化机器的功能——把一切历史事件都转化为当下政治的象征。

在电影中，清帝国被描绘成“代表文明的统一力量”，而反抗者被塑造成阻碍民族团结的地方势力。这种叙事逻辑与中修政权今日对台湾的官方态度一模一样。影片试图让观众在情感上认同“国家统一”与“军事征服”的等价关系，从而接受国家暴力的合法性。

这是最危险的意识形态武器：让人民在感动中丧失警惕，让暴力披上光荣的外衣。

二、修正主义的“民族电影”——阶级政治的外衣

《澎湖海战》的问题不止在于历史歪曲，更在于其政治功能。

它表面上是“民族叙事”，实质上是阶级政治的遮蔽。

毛泽东曾指出：“一切文化，都是一定阶级的文化。”

所谓“民族电影”，若脱离阶级分析，必然沦为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

影片把“祖国统一”描绘成全民意志，却刻意隐去清帝国征服背后的阶级结构：征台战争并非“民族解放”，而是封建官僚与地主阶层为了征税、夺地、压榨岛民的统治战争。被征服的并非“敌国”，而是普通劳动者——农民、渔民、手工业者。

今日的中修政权以“民族复兴”掩盖其官僚资本的扩张逻辑；同样，影片以“历史正义”掩盖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再生产。

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本质：它用社会主义的语言、民族的符号，为资本与权力的集中提供精神外衣。

三、文化垄断与国家机器的结合

《澎湖海战》的背后，是整个文化工业体系的国家化。

出品方包括中央宣传部指导的中国电影集团、解放军文化中心、上海影业等垄断机构，投资额超过8亿元人民币。影片的主创团队几乎全部来自体制内部，“审查通过”在剧本阶段就已确定。

这说明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已不再是艺术创作，而是意识形态生产的工业化流程。

它的目标不是表达，而是灌输；不是讲故事，而是制造信仰。

资本与政治在此完成了彻底融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形式，不再是商业娱乐，而是情感工程。它通过视觉震撼与民族情绪调动，将观众卷入国家叙事中，让人民在消费中参与对自身的精神驯化。

这种机制正如葛兰西所说，是“文化霸权”的现代形式。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应由群众创造、由人民掌握；而在修正主义国家，文化被少数官僚与资本垄断，用以制造服从。

四、对台湾人民的侮辱与剥夺

《澎湖海战》不仅是一部修正主义电影，更是一种对台湾人民的侮辱。

影片的主线是“祖国统一的必然”，却完全剥夺了台湾人民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主体性。

它没有描绘岛上人民的生活，没有呈现他们的劳动与抗争，只留下“被收复的土地”这一概念。

在银幕上，台湾不是人民的家园，而是被征服的战利品。

这种叙事逻辑在今天尤为危险。它向世界宣告：

“台湾的存在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大陆政权的容忍。”

这正是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的精神核心——以国家意志替代人民意志，以统一神话掩盖社会多样性。

对台湾人民而言，这种“光复”与“统一”的影像并非荣耀，而是被再度殖民的文化创伤。

他们的历史被改写，他们的身份被压抑，他们的未来被预设。

电影没有传递和平，而是在视觉上预演一次战争。

五、文化扩张：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形式

许多人以为文化宣传无害，但《澎湖海战》恰恰证明：在修正主义体系中，文化早已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不仅是经济扩张，更是思想与文化的支配。

今日的中修政权，虽然在经济上与西方竞争，但在意识形态上却采用相同的手段——通过影视、教育、网络等方式，把民族主义与国家忠诚灌输给人民，把扩张与征服描绘为“历史使命”。

《澎湖海战》与美国的《壮志凌云》本质相同：

前者鼓吹“统一台湾”，后者颂扬“自由世界”；

前者服务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后者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二者不过是不同面孔的帝国宣传。

这说明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并非对立，而是共谋。

它们都需要文化机器制造幻觉，让人民为资本的战争流血。

六、人民的电影在哪里？

面对这种文化垄断，我们必须提出反问题：真正的人民电影在哪里？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这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文化革命的核心。

人民电影的任务，不是制造崇拜，而是揭露压迫；

不是煽动仇恨，而是唤醒觉悟。

今日的“主旋律电影”，恰恰与这一方向相反。

它为资本服务，为官僚立传，为国家暴力辩护。

因此，反修正主义的文化斗争必须重建人民的文艺阵线——

要有新的导演、新的作家、新的创作者，用现实的语言揭露被掩盖的真相。

人民的电影应当拍出：

- 学生的抗议与工人的罢工；
- 农村的贫困与官僚的腐败；
- 青年的迷茫与觉醒；
- 被压迫者的尊严与希望。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片”，因为它拍摄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人民的斗争史。



七、结语：打碎修正主义的镜头

《澎湖海战》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面镜子——

它映照出修正主义政权的野心、恐惧与虚伪。

他们害怕人民遗忘国家的力量，于是让电影替他们制造记忆；

他们害怕群众看清现实，于是让历史幻觉取代真相。

然而，历史的方向终究不在镜头里，而在人民手中。

当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抗税，当青年拒绝再被民族主义煽动时，修正主义的银幕便会碎裂。

真正的“澎湖海战”不会发生在电影里，而会发生在现实里——

不是帝国征服台湾的战争，而是人民反抗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战争。

那将是一场新的战斗，不为“统一”，只为解放。

让人民的镜头对准人民，让真正的历史回到人民手中。



民族主义的狂欢与阶级现实的遮蔽

2025年10月，日本政坛迎来历史性一幕——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成为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几乎同时，中国国内网络出现了以“主持人肖雄”式舆论人物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高呼“中日必有一战”“再现甲午复仇”。两岸的喧嚣遥相呼应，一方以“自主防卫”与“强化军力”为号召，一方以“民族复兴”与“外敌威胁”为旗帜。

表面上，这似乎是两国民族情绪的对立；而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看，却是资本主义体系两端的镜像——日本右翼与中国修正主义，正在通过彼此的存在，互为支撑、互相塑造。

一、民族主义的社会根基

民族主义的复燃不是偶然，而是经济危机与社会不平等的反应。

日本长期处于经济停滞与人口老化的结构性困境中。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收入萎缩，使社会怨气集中于“国家衰落”的叙事。高市早苗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崛起的——她把国家问题简化为“安全危机”，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强化军费、扩大对美合作。这套路线迎合了资本集团和军工产业的需要，同时也让被边缘化的中产阶层在“强国幻想”中找到心理补偿。

中国方面，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贫富差距扩大、青年失业高企、社会流动受阻，而统治阶层不可能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民族复兴”“外部威胁”成为稳定舆论的关键工具。网络上的“主持人式爱国者”，便是这种宣传逻辑的产物——他们在情绪上激发仇恨，在语言上宣称忠诚，在结构上掩盖现实。

民族主义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语言：它让被压迫者误以为敌人来自国境外，而非身后的权力与资本。

二、高市路线的政治本质

高市早苗的当选，并非“女性政治进步”的象征，而是日本战后保守政治进一步右转的标志。她本人出身于长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自民党右翼派系，政治资助来源广泛涉及军工企业与能源财团。她主张：

- 将日本自卫队改组为“国防军”，赋予其对外作战权限；
- 推动与北约的合作机制；



- 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立场保持一致，强化“台日安全一体化”；
- 加大对华“警戒宣传”，以民族情绪掩盖国内结构性危机。

这并非真正的“独立自主”，而是日本资本在美国战略框架下的再定位——为美国亚太军事体系提供中坚支点。

然而，这种外向型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延伸：

- 军备开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 “安全焦虑”被包装成政治动员；
- 战争准备被视为振兴工业的手段。

当民族情绪与资本利益结合，国家机器便以“捍卫和平”的名义走向战争。

三、修正主义与右翼的互补关系

修正主义的本质是以社会主义话语包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了维持政治合法性，它必须不断制造“敌人”，让群众相信外部威胁比内部矛盾更严重。

因此，在高市政府的军国主义叙事出现时，中方舆论立即以镜像方式回应：“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必须备战”。修正主义与右翼政治在舆论上互相强化，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中国仍是日本制造业链的重要市场，日本资本也深度参与中方金融与高端产业投资。

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存在”来维系内部秩序：

- 日本政府通过中国威胁论重塑民族凝聚力；
- 中国修正主义政权通过日本威胁论掩盖失业、通胀与社会不公。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对抗往往是“瓜分世界的竞争”，而非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今天的亚洲局势正重演这一规律：资本为利润竞争，国家为资本服务，而群众被动员为炮灰。

四、民族主义的媒介化与情绪化

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不再依赖传统宣传机器，而是通过算法与娱乐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

“主持人肖雄”式的网络人物不过是这种机制的显性部分。算法鼓励愤怒、对抗、情绪化表达，因为这些能带来更高的点击率与广告收益。民族主义被娱乐化、表演化：直播间里喊口号、做剪辑、卖纪念品，爱国成了可以消费的情感。

这种表象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当青年沉迷于“保卫国家”的口号时，他们同时被房贷、学贷与低工资困住。民族热情被转化为资本利润，愤怒被导向虚拟敌人，而真正的压迫者得以稳坐其位。

五、战争的虚幻与阶级的真实

“中日必有一战”的口号看似强硬，实则荒谬。资本全球化使两国经济高度交织，真正的统治阶层在供应链和金融市场上早已融为一体。战争并非他们的目标，战争的威胁才是他们的财富。

军备竞赛、外交紧张、媒体恐慌都能带来预算增加、股市波动与民意操控的机会。

受害的始终是工人、农民与青年。

在这样的格局下，民族主义战争如果爆发，也不会改变历史方向——它只会让资本主义以更残酷的形式继续存在。真正的“必然之战”，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斗争。

六、国际主义的出路

马列毛主义一贯主张人民之间的团结，而非国家之间的敌意。

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对现实阶级关系的认知。

亚洲的劳动者必须看到：无论是东京的工厂工人，还是广州的外卖骑手，他们面对的都是同一种力量——资本与官僚的联合统治。

当青年被民族主义煽动时，应当问：是谁让我们贫困？是谁在利用我们的愤怒？

只有打破这种意识形态循环，才能防止战争真正降临。

这需要新的国际左翼力量，重新连接工人组织、学生社团与独立媒体，建立反战、反资本的群众网络。

真正的“保卫和平”不是扩军备战，而是揭露和平被谁垄断、战争为谁准备。

七、结语：打破幻象，回到现实

民族主义的狂欢掩盖了阶级现实。高市早苗的上台、修正主义的喧嚣、“中日必有一战”的口号，都是同一个体系的不同语言。

它们让人们忘记真正的敌人是谁，让社会在恐惧与激情中失去思考。

当国家机器在高喊“安全”的时候，劳动者的生活却越来越不安全；当资本以“爱国”之名要求牺牲时，真正付出代价的始终是普通人。

历史的方向从未改变——和平不会从上而来，正义不会由资本施舍。

只有当工人、青年、农民与被压迫者重新团结，跨越国界地认清自己的共同处境，民族主义的面具才会被撕下，战争的幽灵才会消失。

这场斗争不是虚构的未来，而是正在进行的现实。



停火还是重组？——评2025年10月巴以停火的阶级实质

2025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国际压力与地区强权的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持续近一年的军事冲突。媒体称之为“和平曙光”，各国政府也纷纷表示“形势正在改善”。然而，在加沙的街头，断壁残垣之上，难民依旧无家可归，饥饿、寒冷与心理创伤笼罩着这片土地。

这场停火并不是“和平”的胜利，而是帝国主义秩序的再调整；不是正义的实现，而是统治关系的重新分配。正如列宁所言：“帝国主义的和平就是战争的延续。”一、停火的背景：帝国主义的“调停”与资本的焦虑从表面看，停火是多方外交努力的结果：美国、欧盟、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都声称在斡旋；而联合国则宣称其“人道使命”得到部分恢复。

但从阶级角度看，促成停火的根本动力并非人道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压力。

长期战争使能源价格不稳、全球供应链受阻、难民流动扩大，已威胁到资本积累的正常运作。美欧垄断资本需要暂时“稳住局面”，以便重新分配利润、恢复投资环境。

因此，停火的主导权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它不是人民间的协定，而是强权之间的交易。

以色列得到的，是继续维持军事与经济控制权；

美国得到的，是保留在中东的战略支点；

阿拉伯资产阶级国家得到的，是换取政治资本与外交缓冲；

而巴勒斯坦人民得到的，只是一段喘息期——他们依然被困在围墙之内，被迫在废墟中谈论“和平”。

二、“黄线”的实质：新的殖民划分

停火协议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划定所谓“黄线”，即以以色列控制区与加沙自治区的分界线。表面上，这是一条安全边界；实际上，它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界线。

据报道，停火后以色列仍控制加沙超过半数区域，并通过“安全走廊”“检查点”“无人机巡逻”等方式，对人流、物流实施完全掌控。

这意味着所谓的“撤军”只是形式；殖民秩序并未动摇。

“黄线”的出现让人想起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直尺式边界”。那时的殖民者以和平条约之名瓜分大陆；今天的帝国主义以停火协议之名瓜分民族。

唯一不同的是，殖民者换了面孔——从旧帝国转为现代资本国家，从欧洲强权转为美以复合体及其区域代理人。



三、人道主义的面纱：资本的再生产

停火后，媒体最常用的词是“人道援助”。但统计显示，实际进入加沙的救援车辆仅为协议承诺的四分之一；救援物资在港口、关卡、物流体系中被层层截留。在这场“援助”运动中，国际资本扮演了新的殖民角色：

非政府组织与承包商获得了重建合同；

跨国公司进入灾后市场；

金融机构通过“重建基金”获取利息。

加沙的重建并非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开路。破坏与重建之间，资本实现了新的循环——战争制造需求，停火创造市场。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写道：“资本输出与战争紧密相连。”这正是今天的现实写照。

战争摧毁一切，以便重建；而“重建”不过是新一轮剥削的开始。

四、修正主义国家的沉默与共谋

这场停火也揭示出某些自称“反帝”的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矛盾姿态。它们在外交辞令上高调宣称“声援巴勒斯坦”，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断以“稳定”“务实”为由维护现行体系。

在国际会议上，它们投下弃权票，避免触怒主要强权；在国内，它们又以“中立”“理性”名义限制民间的声援活动，对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和个人施加压力。表面上是“保持平衡”，实质上是对被压迫者声音的压制。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企业与金融机构仍在与相关地区的经济力量往来，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并未停止。表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际上却在利用战争与封锁维持自身的资本利益。

这种双重立场，是修正主义政治的集中体现：

口头上讲国际主义，行动上顺从全球资本的逻辑；

对外高呼和平正义，对内遏制群众声援；

当世界人民流血时，它们忙于计算订单与收益。

巴勒斯坦的斗争不是遥远的地缘问题，而是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斗争。只要这种“名义支持、实质交易”的态度存在，帝国主义就能在新的形式下继续生长。真正的国际主义，不在外交声明中，而在人民之间的团结与行动里。

五、哈马斯与阶级矛盾的困局

在停火谈判中，哈马斯被迫接受多项不平等条件——包括武装限制、政治重组、国际监督等。许多媒体把这描述为“现实主义转变”。但从阶级分析看，这反映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革命的困境。

哈马斯长期处于被围困状态，内部也存在阶级分化。部分领导层依赖国外资金援助与地区强权庇护，逐渐脱离群众。

当武装斗争脱离群众路线，它就可能被同化为资本与外交博弈的筹码。

真正的民族解放，不是外交会议的签字，而是群众力量的觉醒。

如果巴勒斯坦革命不能回到群众中去，不能重新联系工人、农民、青年，它就会在国际交易的夹缝中失去方向。

六、国际媒体的双重话语

停火后，西方媒体把焦点放在“恐怖主义消退”“以色列的克制”“人道进展”。

他们极少提及封锁、饥饿、无家可归的平民，更不谈以色列对基础设施的系统性摧毁。

媒体的任务是制造遗忘。

当战争变成数字和统计，人民的痛苦便失去了政治意义；

当停火被赞颂为“历史时刻”，剥削便获得了道德合法性。

在这种语境下，国际舆论不再是揭露真相的工具，而是压制愤怒的工具。

这正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它不靠谎言维持，而靠选择性真相。

七、巴勒斯坦问题的世界意义

巴勒斯坦不是孤立问题，而是世界体系矛盾的集中体现。

它展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三个基本事实：

1. 帝国主义仍然存在。旧殖民体系在形式上崩溃，但通过金融、贸易、技术垄断继续统治。
2. 民族解放尚未完成。被压迫民族在独立之后往往被纳入新的依附体系。
3. 修正主义阻断了革命的延续。当革命国家变为资本国家，国际主义便退化为外交辞令。



停火不会终结斗争，它只是让矛盾暂时潜伏。

真正的和平，只有在剥削与压迫消失时才可能存在。

八、革命的方向：从民族解放到阶级解放

对巴勒斯坦人民而言，当前的任务不仅是结束封锁，更是重新建立独立的工农力量。

在加沙的废墟上，人民委员会、互助组织、志愿医疗队、青年社团正在萌芽。这些都是未来革命的细胞。

革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框架——

不是单纯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不是依赖外部援助，而是依靠人民自身的组织与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他们看似强大，但离开了被压迫人民的顺从，他们便无所依附。

九、国际主义的呼声

停火应成为国际工人阶级重新团结的契机，而不是麻醉剂。

全世界的进步力量应从巴勒斯坦的命运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当资本控制粮食、能源与信息，当战争与贫困交替出现，这不仅是中东的悲剧，而是全球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真正的国际主义，不是“援助外交”，而是阶级联合。

世界各国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建立跨国团结网络，抵制军工资本、抵制帝国主义宣传、揭露修正主义的虚伪。

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反抗，都是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十、结语：停火不是结束，而是序章

2025年的停火，也许暂时平息了炮火，却未触及任何根本问题。

帝国主义依旧存在，修正主义依旧妥协，贫穷依旧扩散。

在这种结构中，所谓“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歇。

然而，每一次停火也孕育着新的觉醒。

当人民从废墟中重新组织，当青年重新学习斗争，当国际工人阶级重新听见彼此的声音，真正的历史将再次启程。

停火不是终点，而是人民革命的新起点。

习近平清洗何卫东：为对台侵略铺路的政治整肃

2023年3月11日，部分解放军代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2025年习近平清洗多名军队高层，此举在军内外引发强烈震动。接下来，我们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对这一事件的实质进行深刻剖析，旗帜鲜明地揭露所谓“反腐”背后的政治清洗与军事整肃，为何这是习近平当局为对台侵略战争铺路、统一军队意志、排除异己的步骤。

事件起因与现象

2025年10月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平当局突然以反腐之名大规模整肃军方高层。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内的九名上将将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10月17日的通报中指称，这9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被清洗的九名将涵盖了解放军各大要害部门：何卫东是仅次于习近平的军委副主席，苗华曾任军委政工部主任，林向阳是东部战区司令员，王厚斌是火箭军司令员，王春宁是武警司令员，等等。如此多的现役上将同时落马，在中共军队史上极为罕见，可谓是197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中清洗之一。这一突然行动表面上由军中反腐名义引出，但其时间点（四中全会前夕）和涉及人员之高级，引发各界对其真实动机的强烈关注和质疑。

官方宣称此番整肃是持续推进军队反腐、“肃清腐败毒瘤”的必要举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整肃的九名上将无一例外都是习近平上台后亲自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据统计，其中有多人出身于曾驻福建的第31集团军，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部队。也就是说，习近平将自己一手提拔的心腹将领如今当作腐败分子拿下，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一时间，军内外议论纷纷：有人惊呼中共军委“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人揣测是否军中发生了什么未遂政变或权力斗争，还有不少网民对官方说辞嗤之以鼻。九名上将同时落马，使得中央军委班子几近“腰斩”，军委权力结构因此面临重组。这一系列反常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廉政行动，而更像是一场为巩固最高领导人权力服务的政治清洗和军事整肃。

揭露“反腐”话语的虚伪性

表面上看，习近平当局给此次整肃披上了“反腐败斗争”的外衣。然而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套“反腐”话语极其虚伪。首先，从涉案人员来看，习近平口中的军中“大老虎”并非别人，正是他近年来悉心提拔的亲信将领。如果说这些人真的腐败透顶，那难道不恰恰证明提拔重用他们的习近平本人才是最大的腐败总后台吗？正如有评论指出，如果这些上将特别腐败，那也只能说明他们的腐败依靠的是习近平赋予的权势，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不仅没有成功，



其次，从指控内容看，当局罗列何卫东等人的“罪状”时，大量用语与其说是经济腐败，毋宁说是政治“不忠”。例如军报社论除了提及违纪违法、数额巨大之外，还严厉指斥他们“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这些措辞明显超出了腐败范畴，上升到政治立场和忠诚度的问题。正如评论指出，“忠诚失节、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就只能是政治罪名，和腐败扯不到一起”由此可见，所谓“反腐”不过是欲盖弥彰的借口，真正触怒最高当局的是这些将领在政治上的不可靠、不一致。当局一方面高喊“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喊得冠冕堂皇，另一方面却将反腐作为清除异己、整肃军心的工具。说穿了，最大的腐败分子恰恰是以反腐名义集权的习近平本人：他通过反腐打击政敌、震慑官僚，巩固了个人独裁地位，却从未真正触动权贵资本形成的腐败根源。当权者把反腐弄成选择性武器，护犊则庇护，除异则痛打，这样的“反腐”只是一场自我服务的政治秀。当连升上王者皆成囚徒，反腐话术早已沦为笑柄。难怪连一些中国网民都讽刺道：“反腐越来越像个笑话了”。

军内官僚阶层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

要深刻理解这场军队大清洗，还需从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入手，揭示军内官僚阶层如何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曾警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我们身边。今天的解放军高层正是这样一批特殊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头顶“人民军队”的红帽子，实际上早已背离无产阶级立场，演变成以特权牟利的官僚资产阶级。自从邓小平执政后推行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军队也逐渐丧失了人民军队的本色。上世纪80-90年代，解放军甚至直接下海经商，大搞军队企业，军头们利用手中权力大发横财，培植利益网络。即便后来江泽民下令“军队不经商”，也无法刹住军中权钱交易之风——军队经商停止了，但军中官僚对升迁权力的资本化、军工采购领域的利益输送等更加隐蔽的腐败形式愈演愈烈。郭伯雄、徐才厚时代，卖官鬻爵达到登峰造极，少将军衔明码标价，军委总部沦为权钱交易所。习近平上台后一度整肃郭徐，但并未铲除军内官僚集团的阶级基础。相反，他把原有山头肃清后换上自己的亲信，结果旧的军阀走了，新的军阀依然照旧。这些年来，军费开支每年高速增长，然腐败顽疾依旧丛生，表明军队高层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并未因人事更替而改变其剥削本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腐败不是个人品德问题，而是阶级属性的反映。当军队脱离人民、变成统治集团谋私利的工具时，军队领导层就异化为新的资产阶级。人民解放军曾以艰苦奋斗、严明纪律著称，那是因为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在指引，有群众监督在发挥作用。可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军中高官享受远超普通士兵和工农的物质待遇，住豪华军官城、握庞大利益网，早就同工农大众离心离德。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权贵资本的代理人，又是官僚资本的直接参与者：有人把持军工产业链，从中中饱私囊；有人退役后出任国企高管、进入资本市场继续捞钱；还有人大肆安插亲属经商，形成“军产阶级”。如此一来，解放军高层早已蜕化变质，不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代表着一小撮特权集团的私利。正因如此，党内资产阶级在军内坐大，必然要定期通过内部清洗来重新整合权力版图。此次何卫东等人的倒台，表面看是个人腐败问题，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不同派系此消彼长的结果。这些将领不是无辜的廉洁军人，相反也是权钱体系中的一环；他们今天被抛出祭旗，只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而非社会正义的伸张。对无产阶级和普通士兵来说，这种上层权斗并不会带来军队性质的进步，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部的论断是何等英明。只要国家政权性质不变，军队高级将领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其腐化堕落就不可避免；反之，当权者也只能靠周期性“大清洗”来维持其独裁统治的稳定。

对台战争背景下的军队整肃

我们还必须把这场整肃放在当前对台战争阴云的背景下来考察。从近期局势看，台海战端一触即发的危险正在上升，习近平当局谋划对台发动侵略战争已是不争的野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曾警告说，习近平已指示中共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2027年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在建军百年时实现把解放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并且不讳言“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由此推断，2025年前后正是北京当局为对台作战做冲刺准备的关键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整肃军队高层的动机就变得清晰起来：习近平需要在对台开战前清除一切不可靠、不服从的军中势力，确保指挥链绝对忠诚，以统一军队意志执行侵台计划。官方发布的信息也印证了这一点。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在报道何卫东等人落马时的社论中坦承，这些上将“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翻译过来就是他们动摇了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显然，在战前动员阶段，任何对最高领袖不忠的苗头都被视为心腹大患，必须尽早清除。社论还痛批何卫东等“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可见当局认为这些人影响了军心和统一意志。因此，习近平以雷霆手段将其拿下，杀鸡儆猴，

意在震慑军中可能的反对声音，让剩下的将领对其唯命是从。这种手法与希特勒当年在大战前夜长刀之夜清洗纳粹党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通过内部肃反，在恐怖服从中塑造军队对最高统帅的个人效忠。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趁机进一步将军权一网打尽、收归己手。据悉，何卫东倒台后，习近平迅速提拔更亲信的将领递补进军委，甚至让军委班子由7人缩减为4人，把决策层极度集中在自己和少数嫡系手中。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为未来对台作战做组织和人事上的准备。

更直接的证据是，中共官方在宣布军中反腐战果的同时，高调强调要加强练兵备战。军报社论号召全军上下“勇扛时代重任，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些话无疑是为战争做舆论和思想动员，暗示全军要全力以赴完成“捍卫主权”的使命。所谓“主权安全”，在中共语境下主要指的就是台湾等问题。联系到习近平近年不断给解放军下达“随时听令打仗”的训令，以及频繁在东南沿海部署军演、增调兵力，可以判断：此番整肃后的权力再集中，正是为了加强对台侵略战争的准备和部署。通过清洗腐败将领，习近平一方面试图塑造军队“更纯洁、更有战斗力”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为可能的侵台战争扫清内部障碍。正如有分析所言，习当局这是在“未开战先内斗”，把不放心的人先清理掉，以免临阵生变。值得一提的是，被免职的将领中包括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东部战区正是对台作战的主力战区。这说明在关键战区的指挥官位置上，习近平要换上绝对效忠且他认为更可靠的人选，以确保对台军事行动能够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总之，此次军队高层大换血并非孤立的反腐行动，而是服务于习近平对台战争战略的一环。其目的在于重塑军队高层结构，使之完全听命于习的指挥，为即将到来的侵台战争集中意志、做好统帅控制。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倾向

进一步分析，中国当局策动对台侵略战争的深层原因，离不开对其国家性质的清醒认识。尽管中共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实际上当今中国政权早已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权，并在对内对外政策上表现出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高度融合，国家机器直接服务于大型垄断企业和金融寡头的利益，利用政治权力巩固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的资本主义形态。当代中国正符合这一特征：一方面，权贵资本和官僚资本勾结形成垄断寡头，控制了金融、能源、通信、军工等关键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党政军高层人物本身就化身资本家，通过家族成员和白手套掌控庞大财富。据报道，中国的亿万富豪中相当比例是红色权贵后代，他们利用权力便利积累资本。而国家则扮演着“保驾护航”的角色，通过公权力压制工人权益、掠夺资源、保护垄断企业在国内外的扩张。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正日益展现出一个新兴帝国主义强国的姿态。列宁曾总结帝国主义的特征包括：“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等。如今的中国在全球到处投资和贷款，大搞所谓“一带一路”倡议，看似援助发展中国家，实则输出过剩资本、控制别国战略资源。许多亚非拉国家因大量举债于中国而掉入“债务陷阱”，港口、矿山被迫租给中资企业长期经营，这正是典型的新殖民经济手法。此外，中国积极在海外拓展军事存在，在吉布提建立军港，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部署安保，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印度洋秀肌肉。这种以军事力量保护海外经济利益、争夺海洋通道控制权的行为，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中国官媒鼓吹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幌子，其实际行动却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自身势力范围和话语权。对内对外的种种表现说明，当今中国执政集团奉行的是民族主义包装下的帝国主义政策。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通过垄断和剥削获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扩张，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名谋求地缘政治和经济霸权。对台湾的野心正是这种帝国主义倾向的集中体现。台湾对中共而言，不仅是民族主义叙事中的“神圣领土”，更被视作突破第一岛链、进军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地，以及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的关键资源。一旦吞并台湾，北京的区域霸权地位将大大提高，垄断资本也将吞噬台湾的经济资源。因此，对台战争并非什么正义的民族统一事业，而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图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是各国统治阶级争夺掠夺利益。中国当局鼓吹的“反分裂”、“国家统一”只是在煽动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为其扩张计划披上正当性外衣。然而，无论其辞藻多么动听，本质上这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试图以武力攫取利益和权力的战争冒险，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阴谋

面对习近平当局蓄谋已久的对台侵略准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人民必须提高警惕，认清其战争阴谋的本质并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帝国主义者之间或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发动的战争，从来不是人民的利益所在，而只是统治阶级争夺势力的手段。一旦台海爆发战火，最先遭殃的将是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工农大众：前线的普通士兵要为统治者的野心充当炮灰，台湾和大陆的平民将蒙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全球经济也将因大战陷入混乱。而这场浩劫背后的既得利益者，只会是军火商、垄断资本和极少数权力野心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的兄弟姐妹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大陆、台湾乃至美国、日本的劳动人民都不应为资产阶级的战争冒险去彼此残杀。我们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揭穿中国修正主义当局假反腐之名行战争准备之实的骗局，决不要被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谎言所蒙蔽。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早已背叛了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新势力。国际左翼和进步人士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共当局的侵略图谋，同时也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势力趁机坐大。我们既不支持北京对台湾的武力侵犯，也警惕其他大国以“保护”之名进行军事介入扩张。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策源地。

当前，中国国内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在暗中对战争前景感到忧虑。尽管中共高压统治下少有人敢公开反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并不想卷入一场血腥冲突。国际无产阶级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声援台湾和大陆的劳动群众反对战争的声音。我们要向全世界揭露：习近平当局高唱爱国主义、反腐倡廉，其实是在转移矛盾、制造敌意，为自己在国内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寻找出路。经济下行、失业攀升、社会不满滋长，这是他们急于对外发动军事冒险以转嫁矛盾的深层动机。对此，世界劳动人民应深刻理解，并加强国际团结，防止被各自统治阶级利用去互相厮杀。

最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郑重呼吁：制止帝国主义战争阴谋，唯有依靠人民大众的觉醒和团结斗争。让中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携起手来，高举反战反侵略的旗帜，反对习近平修正主义集团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我们坚定支持台湾人民反对吞并的自决权利，也同样关心大陆普通士兵的生命权利，不许他们被送上为独裁者火中取栗的战场。工人阶级应该把帝国主义者策动的战争变成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运动，正如列宁所倡导的那样。只有推翻包括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祸患。在这个紧要关头，世界进步力量务必密切合作，坚决挫败中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图谋。让我们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共同奋斗：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民和平；反对资本帝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新黎明！

坚决反修防变，重建毛泽东式党建路线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及其最先进分子的先锋队，应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承担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在于它“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并且“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也就是说，共产党不谋求与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相违背的特殊利益，它追求的是全人类解放的共同事业。马克思曾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不仅是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是彻底消灭阶级剥削，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世界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用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践，领导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

在实际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反复强调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警示，党的性质决定党必须始终保持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并严把入党关口，反对各种机会主义、保守主义势力的侵蚀。恩格斯也告诫工人党“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强调无产阶级党具有“铁的纪律”优势（注：该引文引自相关研究文章，非原始文献）。总之，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无产阶级政党视为“受苦最深阶级的最广大群众的核心组织者和领导者”，主张通过党的坚强领导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变革。

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原则与民主集中制

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建立一支高度组织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必要性。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指出，工人阶级在面临沙皇专制等严峻条件下，仅靠群众自发运动往往难以形成革命觉悟。他主张培养“职业革命家”——即经过严格考察和长期磨炼、具有坚强党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来领导群众斗争。列宁认为，通过“政治斗争塑造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并以“党的集中制”克服群众运动自发性的不足是建党工作的核心任务。因此，他在揭露经济唯物主义者教条式主张后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集中、严明纪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在《策略提纲》等著作中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党的组织原则，其要义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即在党内鼓励充分讨论和批评，同时决策后必须绝对统一行动。这一原则既保障了党内民主，使党员能够参与路线讨论，又确保了执行的坚决和统一，防止组织涣散和机会主义倾向。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是夺取政权的前提。他曾明确指出，在革命高潮时，无产阶级已具备独立斗争的觉悟，需要一个“富有天才、受过专业训练”的革命组织来指导；而当遭遇反革命挫折时，更需要通过严明的纪律和集中来防止动摇。这种建党思想被列宁称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的任务，是阶级政党的根本任务。总之，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发展为：用职业化的先锋队来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统一战斗力和正确路线。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建党与整风理论

毛泽东思想对党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群众路线、思想建党和整风制度三个方面。首先，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群众路线”这一工作原则。他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被毛泽东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要求党组织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根据群众经验制定政策，再将政策交还群众实践和检验，强调领导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正如有关研究所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实质上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结合起来的一条核心原则。通过坚持群众路线，党能够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避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确保路线、方针始终符合人民利益。

其次，毛泽东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的必要性。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主张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斗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锤炼党员的革命精神。据延安时期文件记载，“对于新的领导班子，仍应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实现思想革命化，使它更充分地发挥战斗指挥部的作用”。这一指示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路线在建党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在他的指导下，党内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思想原则，并通过组织学习、批判错误倾向等方式，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才能保证党始终走在工人阶级的最前列。

因此，思想建党成为保持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策略。

第三，整风制度是毛泽东在党内外环境严峻时期提出的制度创新。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被认为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革命运动。整风运动内容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方针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开展整风，党纠正了“只会照抄本本”的教条主义，落实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原则，使党员干部统一了思想、保持了革命性。正如资料所指出：“用整风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一个重要贡献”。换言之，整风不仅巩固了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成果，也为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制度经验。通过不断纠正党内思想和作风上的错误，毛泽东的整风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内容，强化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强调党的性质必须与无产阶级相一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保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坚持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使党始终保持革命活力；并以整风为抓手，定期进行思想教育和自我革命，维护党的纯洁性和统一性。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建党路线的普遍性与适应性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建设学说既总结了无产阶级政党普遍的建党经验，又强调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灵活运用。在普遍性方面，马列毛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基础、纲领思想、组织原则等方面具有基本一致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代表无产阶级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性，以及坚持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等。这些原则不因国别、时代而改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共同指南。另一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出每个国家的革命道路和党建设方式需根据自身国情加以调整。比如在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广泛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的策略；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殖民地国家，



党的策略可能包括更加重视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等形式。总的来说，马列毛主义认为，党的建树路线必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又根据具体社会矛盾和群众基础制定适合本国条件的方针。这种思想对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革命政党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当代左翼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核心地位和群众路线依然被视作行之有效的经验。很多革命组织在实践中发现，只有通过深入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保持纪律和正确路线，才能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同时，他们也依据本国经济文化、国际局势等具体因素创造性地制定战略战术。例如，在资源贫乏、政治高压的地区，有的党派采取游击战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形式；在开放社会，也有团体强调参与选举并通过群众运动扩大影响。可以说，马列毛主义建党路线的普遍原则为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理论框架，而其强调具体实践的精神又指导这些党根据时代和国情不断调整建设方法。

我们的观点

我们赞成先动员知识分子，再去融工，组织工人参加斗争。

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发起政党的建党方式符合马列主义对革命的认识论：革命最初往往需要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发挥领导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各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知识分子一般受过教育，便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指导群众，同时也能利用自身知识优势组织宣传和筹划斗争。

关于真理报：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rcpconline.com/>

我们的纸飞机频道：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者可通过官网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或者订阅我们的报纸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通过知识分子的引领，可以较快地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并在相对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制定路线。正因为有理论指导，像毛泽东这样掌握“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才能使共产党走上胜利道路。同时，许多被动员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能够迅速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从而丰富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基础。如中国早期党员中许多本为学生、教师，通过实践“完成了阶级立场的转变”；秘鲁和菲律宾的知识分子在炮火中同贫农并肩作战，最终证明了党与群众相结合的可行性。

在实践成果方面：由知识分子推动的革命运动曾多次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和其他早期知识分子领导下，先后推翻了军阀统治、国民党反动统治，1949年建国；越南共产党在胡志明领导下抗击法、日、美帝国主义，1945年越南独立并于1975年统一南北；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夺取了罗德西亚白人政权；菲律宾共产党在1960年代以来虽然尚未夺取国家政权，但长期坚持人民战争，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具生命力的共产党之一。即便是光辉道路，在最初阶段也曾席卷广阔山区，对秘鲁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以上实践表明，知识分子建党的策略路线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历史正当性，能够有效凝聚有限资源领导群众，并非空中楼阁。

然而，这一路线也面临现实挑战和局限。一方面，知识分子组织的革命政党容易出现脱离群众、教条主义甚至宗派主义的问题。如光辉道路在农村实行极端血腥的“全民革命”政策，终致群众反弹和运动瓦解；菲律宾共产党在90年代也曾发生严重分裂。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相比工农，通常不直接参与基层生产劳动，若不及时与群众融合，就难以理解群众需求、同群众共呼吸、共命运，这会影响党的群众基础。历史经验还表明：某些革命胜利后，原先的知识分子干部若不能继续革命，可能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如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政府出现的种种腐败问题）。此外，当前国际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给知识分子建党提出新课题：如何在后工业社会融合工农以外的新群众力量，如何面对新兴思潮的冲击等，都需要新的理论和策略。因此，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先行建党再融入群众是一条具有实践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建党道路，它强调了理论先导与群众实践的辩证统一，但也必须注意防止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持续接受实践检验和自我革命，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革命案例：知识分子建党与走向群众

实践中许多革命者都体现了“先动员知识分子，组织知识分子，再深入工农群众”的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大量是青年知识分子。以毛泽东为例，他最初是高校教师和报刊编辑，1921年参与创建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他深入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知识分子要深入工农群众，“在武装群众的同时检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毛1918—1922年曾到湖南师大、安源矿区等地向学生和工人群众传道授业，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

使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逐步形成革命共同体。这一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理论宣传为党的形成和群众动员提供了思想武器，但最终必须与农民运动结合，才能形成广泛的革命力量。

越南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胡志明本身也是知识分子（曾留学法国）。在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中，胡志明及其“越盟”将知识分子、海外专家和各界人士团结起来，与工农大众联合推翻殖民统治。胡在《救国报》上呼吁“建设需要人才……只要我们善于选拔、分配和任用，人才队伍就会不断发展壮大”。独立后，胡志明创办政府，重用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设，仍强调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5年9月，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摆脱殖民统治，标志着知识分子领导建立的共产党成功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的创始人阿维马埃尔·贡萨洛原是阿亚库乔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和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于1960年代末创立党组织。光辉道路最初在学生中传播，曾在多所大学的学生群体中站稳脚跟，但在1973～75年多次选举失利后，决定放弃校园工作，转向农村重新整合。1970年代末，贡萨洛发动武装起义，将斗争扩展到山区贫农中，鼓动农民加入人民战争。光辉道路以其理论激进著称，但也产生了极端暴力，最终在90年代被镇压。该案例表明，知识分子领导的党可以有效在农村动员群众，但若不能保持灵活民主，就可能导致路线失误。

菲律宾共产党（CPP）的创建者何塞·马利亚·西松博士是一位大学教授，1968年在马尼拉成立CPP并指导组织新人民军。他强调农业国情下“农民阶层仍是人口最多的阶层”，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是革命“主要内容”。西松及CPP初期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知识分子参与，但很快将战略重心放在农村，根据地建设中动员贫农支持和参军。西松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新民主革命的核心力量，党是他们的先锋队。迄今CPP仍在继续武装斗争，其经验证明：知识分子建党与领导，结合深入的群众工作，可以长期坚持人民战争道路。

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类似的案例。罗伯特·穆加贝等早期领导人大多受过教育（教师、留学背景），他们于1963年建立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并领导边界战争。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领导人与广大非洲农民结成统一战线，进行游击斗争。经过多年斗争，1980年津巴布韦摆脱白人少数统治，建立了独立国家。虽然这一过程中领导层后期出现腐败问题，但穆加贝等人的经验显示了知识分子发动的政党若能扎根农村，便有可能完成民族解放和政权夺取。



结论

马列毛主义的建党理论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强调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群众路线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保障，是推动社会根本变革的重要政治路线。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常以先进知识分子为先导，通过思想改造和群众实践，逐步实现与工人农民的深度融合。毛泽东、胡志明、贡萨罗、西松等革命者的实践表明，知识分子建党并非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而是一种以理论先导、再深入群众的策略路径。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这一路线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既要重视理论整顿与思想建设，也要持续推进组织的群众化与阶级化。唯有如此，才能防止党组织蜕变，始终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和革命使命。



我们不会停止斗争，我们要把斗争的旗帜举得更高——印度辛加雷尼工人联合会声明

毛主义道路



多少年了，戴着面具的“英雄”们……你们的孟什维克式阴谋……

致亲爱的革命队伍、民主人士与广大人民：

印度人民数百年来一直为消灭社会中的阶级、为建立一个没有种姓歧视、没有统治与剥削的社会而斗争。这样的斗争以各种形式持续至今。印度人民有时蒙面示威，有时举起黑旗，有时组织村庄抵制运动，有时对剥削者实行罢工停产。工人们通过罢工与停工进行抗争，也采取过许多合法形式的努力。最终，人民对压迫他们的“反动公仆”施以严厉惩罚——这是历史的事实。

自辛加雷尼早期以来，抗议与罢工就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自“贾吉提亚拉凯旋行军”（Jagityala Jaitrayatra）以来，辛加雷尼的运动警笛便一直在鸣响。从1982年辛加雷尼工人联合会（Sikasa）成立之初，伴随“不再是奴隶和叩头者！”的口号，辛加雷尼的工人运动便成为印度煤矿工人斗争的典范。我们通过对饮水、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的斗争，为工人们取得了许多成果。工人们在反动国家实施的各种限制下坚持不懈，把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也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努力。在加雷尼工人联合会（Sikasa）组织的斗争中，共有约36名同志流血牺牲。

正如那句真理所说：“没有痛苦的母亲，无法诞下孩子。”对辛加雷尼的工人阶级而言，这已经成为现实——没有斗争与牺牲，就没有权利能够获得。“咒语不能驱除苦难”，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但那些沉溺于婆罗门教“摩奴法论”

（Manuwad）的人【译者注：也即相信种姓制度、来世轮回和统治阶级恩赐的人】却不愿承认这一点。

维努戈帕尔（也即索怒）并非不知道辛加雷尼工人斗争的历史，但如今他却以扭曲的心态歪曲事实、颠倒历史。他正从马克思主义滑向“业报论”的泥潭【译者注：也即佛教“因果论”，相信一切事物均从因缘而生，有因必有果；善业为善因，必收获善果；恶业为恶的原因，必然收获恶果】，逐渐召集一群人来实践他长期滋生的反动思想。他利用金古·纳拉辛哈·雷迪（Jinugu Narasimha Reddy）等人作为代理，像涂蜜的利刃一样行动。他讽刺烈士的牺牲，支持“摩奴教徒的反动仪式”

【译者注：讽刺意味，指印度官方的招降】，妄图阻碍印度革命的进程。他背弃了以民主集中制方式解决思想、战略与政治问题的原则，却改用统治阶级的语言——那是剥削者的代理人之言。他按照既定计划，在党、革命队伍、民主人士乃至人民内部制造混乱。

真正的革命者，为革命事业甘愿无尽牺牲的人，从不惧怕根据时代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战略与战术。我们加雷尼工人联合会（Sikasa）坚信，那些摩奴教徒以“顺应时代”为名宣扬的“业报论”，对革命的推进毫无用处。加雷尼工人联合会（Sikasa）将继续推进合法斗争和民主斗争（legal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为建设一个劳动不再被剥削的社会而奋斗，并根据工人大多数的意见，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失败是胜利之母。”运动与斗争的地点可能改变，但我们从不“弃械投降”。这些道理，维努戈帕尔（索怒）并非不懂，也不是他没有教过、写过的东西。如今他却如得了疯病的病人一般【译者注：原文用的是“a patient of Pachakamarla”】，言行相悖，明知其理论荒谬，却仍制造混乱。

代表辛加雷尼工人联合会（Sikasa），我们再次郑重宣告：我们将继承那面染满芝加哥烈士鲜血的红旗，继续推进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如果你们【译者注：指索怒一众叛徒分子】对烈士的牺牲仍有一丝敬意，就请放弃错误的思想与路线。你们这些阻碍印度革命进步、背叛革命的人，至少不要连你们曾以誓言敬奉的母亲，玛杜拉玛同志（Amma Madhuramma）也一并背叛。

——阿肖克（Ashok）

辛加雷尼工人联合会（Singareni Karmika Samakhya, C.K.S）秘书

来源：“毛主义道路”网站

<https://maoistroad.blogspot.com/2025/10/india-we-will-not-stop-struggle-we-will.html>

菲律宾共产党班乃地区委员会向牺牲的班乃地区革命领导人致敬

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

菲律宾共产党班乃地区委员会向该地区最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之一——罗伯托·莫伊塞斯·卡巴莱斯（威廉同志，Comrade William）致以崇高敬意。该同志于10月5日夜在伊洛伊洛省兰布瑙科托村被军警蓄意杀害。国家反动武装力量声称，卡巴莱斯与其同伴马泰奥·苏亚雷斯（巴东同志，Comrade Badong）在执行逮捕令时进行了反抗。

“班乃的革命武装力量与广大群众深切哀悼，并决心为对威廉同志与巴东同志的奸杀伸张革命正义。”地区委员会庄严宣告。

地区委员会通报称，执行行动的有十余辆载满警察与军人之车辆参与。此次战争罪行由第301旅（指挥：Nhel Richard Patricio）与伊洛伊洛省反动国家警察（PNP-Iloilo，负责人：Bayani Razalan）联合实施。邻居们称，当晚只听到苏亚雷斯住房处传出三声枪响。随后，武装国家部队“声称”已用救护车将两名遇害者送医院，但两人均被宣告“到院即死亡”。

“威廉同志是党与新人民军（NPA）中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地区委员会如是评价。

卡巴莱斯（威廉同志）青年时期曾学医。“他将西医、东医与（菲律宾的）传统医学相结合，致力于改善长期被剥夺适当医疗服务的人民群众的治疗条件。”地区委员会补充道。党的地区领导表示，卡巴莱斯立志成为医生，正是这一愿望促使他投身于旨在治愈被腐败与贫困所侵蚀的社会的革命运动。他数十年为菲律宾大众服务，并与班乃地区委员会密切合作，领导班乃的革命运动。

卡巴莱斯亦曾在1999年被拘为政治犯。军事情报组（Military Intelligence Group, MIG）于1999年6月11日逮捕并拘禁他，但因错误拘捕在五日后将其释放。同年11月22日，军事情报组再次与鲁本·萨卢塔（Ruben Saluta）一同绑架并秘密拘留他，三日后才将其公布。

与此同时，苏亚雷斯（巴东同志）为前人民军成员，数年前因健康理由选择脱离。他始终保持对革命的忠诚，为革命运动提供帮助与支持。苏亚雷斯（巴东同志）亦曾在2012年被拘禁。法院随后驳回对其的谋杀及非法持枪指控，他在被拘两年后获释。获释后他居住在科托村，但持续遭受军方骚扰，军方曾施压要求其加入政府的“回归计划”（“balik-loob”计划，即投降劝降计划）。

卡巴莱斯（威廉同志）一家坚决立场

卡巴莱斯家属与亲属发表声明，表明他们坚决反对马科斯政权为其有预谋杀害所编造的谎言与辩解。“我们不会接受别人对他说法的虚构，尤其不会接受那些杀害他者对罗伯托·卡巴莱斯的诽谤，”

声明写道。家属表示，尽管他们在父亲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上经历了艰难困苦，但他们将永远支持他、尊敬并钦佩他的信念。

“我们给予他我们的爱与最深的敬礼”，他们写道。对他们而言，他是良父、慈祖与挚爱丈夫。“这就是他——无论国家与其雇佣的传播者如何散布谎言与阴谋来操控叙事、为其杀害辩护，这些都改变不了他的本来面目。”家属声明称。

“我们的父亲决定离开家庭，将生命奉献于争取变革、与贫苦与无权者站在一起。”家属对许多曾受父亲服务并与之并肩工作的群众所表现出的团结表示慰藉，并感谢所有持续支持他革命道路的人。

家属向公众发出挑战：在相信军警关于其父被害之说之前，请倾听实情，并睁开眼睛看清官僚体制中的系统性腐败、少数人通过掠夺积累财富、以及灾难与危机期间穷人的受苦。“深思再三……我们的父亲并非错误。”家属写道。



来源：“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网站

<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angbayan/cpp-regional-committee-honors-martyred-panay-revolutionary-leader/>

反克利盖的通告

德国

K·马克思和F·恩格斯

在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马克思、载勒尔、魏特林、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出席参加的会议上，关于纽约出版的德文报纸。

海尔曼·克利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1]

大家（除魏特林一人“投反对票”外）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并附论据。

决议

（1）“人民论坛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该报上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

（2）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界代表。

（3）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4）本决议连同论据将分发给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

（5）本决议送交“人民论坛报”编辑部一份，要求该报在最近几号上将此决议连同论据一并发表。

恩格斯、菲·日果、路易·海尔堡、
卡·马克思、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沃尔弗
1846年5月11日于布鲁塞尔

第一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

“人民论坛报”第13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告妇女书”的文章。

（1）“妇女是爱的祭司”。

（2）“送我们到这里来的是爱”。

（3）“爱的使徒”。

（a）文学的插曲：“闪闪发光的仁慈的眼神”；“真理的声音”。

（b）虚伪粗鄙的向妇女captatio benevolentiae〔讨好的企图〕：“你们即使穿着女王的服装也仍旧是妇女……你们也没学会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哄人。你们的心肠太软，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不幸的孩子饿死在母亲手里。”

（4）“可爱的小宝宝的未来”。

（5）“相亲相爱的姊妹们”。

（6）“啊，请听一听我们的话，假使你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背叛爱”。

（7）“爱的”。

（8）“用爱”。

（9）“为了爱”。

（10）“我们向你们乞求（泣诉）〔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的最神圣的爱的事业”。

（c）美文学和圣经上的庸俗论调：“妇女命定生产人类的儿女”，这等于指出：男人不能生孩子。

（11）“充满爱的心灵必然发展成共性的圣灵”。

（d）插曲式的Ave Maria〔福哉，马利亚〕〔注：天主教祷告的头一句。——编者注〕：“女人们，你们有福了，你们三倍地有福了，因为你们命定要给早已预言过的幸福王国以第一次圣化。”

（12）“相亲相爱的姊妹们”。

（13）“不是爱而是恨”（资产阶级社会跟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

（14）“啊，亲爱的！”

（15）“把爱送上宝座”。

（16）“由互爱而结合起来的积极的人们”。

（17）“爱的真正祭司”。

（e）美学的插曲：“假如你们胆怯的心灵还没有忘记作出几次美妙的飞翔”（这是能否实现尚待证明的魔术）。

（18）“爱的世界”。

（19）“恨的王国和爱的王国”。

（f）欺骗妇女的企图：“因此你们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影响，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就会垮台而让位给新生的爱的王国”。

（g）旨在压倒理智声音的哲学喇叭声：“让全人类永远安然自得，这就是你们活动的最终目的。”

（20）“你们的爱”。这是向妇女要求“最热烈的”爱的借口，以便她们“一视同仁地把爱施舍给一切人”。这一要求是既下流的，又非分的。

h）遁逃曲：“成千上万被遗弃的孤儿正在消灭他们所处的可怕的环境”。这里“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孤儿”消灭“环境”，还是“环境”消灭“孤儿”？

（i）新共产主义政策的表白：“我们不想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让高利贷者保留已经拥有的财产吧；我们只想防止继续盗窃国民财产的行为，防止资本以后剥夺劳动的合法财产。”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应该是：“每一个穷人，一旦保证他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可能，他立刻就变成人类社会有用的成员。”

（根据这种说法，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就是资产者，包括克利盖十分憎恨的纽约资产者在内。）“假如社会给他一块土地，使他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会永远有这种劳动的机会……如果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14亿英亩国有土地）[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不用来买卖而以一定数量交给劳动人民，那末美国的贫困现象就会一举而消灭，因为那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亲手来给自己建设不可侵犯的家园了”。本来应该懂得，想用一道法令来阻止克利盖所期望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工业制度，或者使东海岸工商业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蛮状态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可是，为了迎接上述幸福时刻的到来，克利盖已在准备做如下一种乡下牧师式的宣教：“那时我们就能教导人们和睦相处，彼此减轻一切生活上的负担和困难，并且

（21）在大地上建设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

（每村都恰好占地160英亩）。

克利盖在结束对已婚妇女的号召时说：“首先你们要向

（22）自己亲爱的丈夫，

恳求他们放弃旧的政策……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孩子，恳求他们为了他们的（蠢人的）[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孩子们醒悟过来”。其次，他又向“少女们”就：“但愿对于

（23）你们的爱人来说

土地解放是他们人格的试金石，请不要轻信

（24）他们的爱，

当他们没有发誓忠实于全人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少女们举止稳重，那末他就会向她们保证，她们的孩子

（25）“也会和她们（指“天国的鸟”）一样成为富于爱情的人”，他在结束他那单调的歌曲时又重复谈到

（26）“爱的真正祭司”、“伟大的共性王国”和“圣化”等。

“人民论坛报”第13号——“答索尔塔”：

（27）“它（共性的伟大精神）[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象爱之火，在教友的眼中燃烧”。

（28）“女人如果没有她能爱、能为之献出自己的颤抖的心灵的男人，那她还成什么样子呢？”

（29）“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

（30）“母爱”。

（31）“对人的爱”。

（32）“爱的所有最初的声音”。

（33）“爱的光芒”。

（j）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类的全部生命服从于它（敏感的心）[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的跳动”。

（34）“在金钱声中，爱的声音沉寂了”。

（35）“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

这样，单是在这一号报纸中，约略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到35种表现的爱。按照这种谈爱的废话，克利盖在“答索尔塔”一文中和在别的地方都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懦怯：他向高利贷者谄媚，答应不动已经属于他们的东西；他发誓说并不想“破坏对家庭生活、国家和民族的依恋”，只想“实现这种依恋”。说共产主义不是“破坏”，而是要使现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幻想“实现”的这种懦怯而虚伪的说法，从头到尾贯串在每一号的“人民论坛报”中。克利盖和政治家们争论时所持的立场跟这种虚伪和懦怯是相吻合的。他认为（第10号上）写文章反对类似拉梅耐和白尔尼这种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就是违背共产主义。因此，象蒲鲁东、卡贝、德萨米这样的人，一句话，所有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只是“有名无实的共产主义者”。至于德国共产主义者已经远远抛开了白尔尼，正象法国共产主义者远远抛开了拉梅耐一样，这一点是克利盖在德国、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

这种爱的呓语将会如何使男女两性都变得神经衰弱，将会如何使大批“少女”变得歇斯底里和贫血，——关于这一点，克利盖自己也该想一想。

第二部分

“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¹²的态度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除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那些地方以外，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使全人类获得幸福这种华丽的词句来装饰土地运动中提出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论坛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

“他们（即美国民族改良派）[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称土地为全人类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

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160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

“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160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

于是，为了把土地留做“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160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将和其他人进行交换，不是交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會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

14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160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875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五口人计算，一共有4375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份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25年增加一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40年。这14亿英亩在40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44亿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十个人中有一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岛就有700万赤贫者。我们在第13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违背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52000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

他在第10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

“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

这就是我的小屋，
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
这就是我的家园，
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气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师傅和农民吧！用这14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我们再引一段话来看看克利盖究竟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经济关系的：

“每一个人必须在每一种行业里至少学会这样一种技巧，使他（万一有什么不幸使他离开人类社会）必要时可以不靠旁人的帮助而能生活一个时候。”

不消说，“大谈”其“爱”和“克己”，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要容易得多。

第三部分 形而上学的夸大

“人民论坛报”第13号刊载了“答索尔塔”一文。

（1）克利盖在这篇文章中说他“不习惯在抽象的不毛之地上玩弄逻辑的戏法”。但每一号“人民论坛报”都证明克利盖正是用哲学的和情感的词句玩弄“戏法”，虽然不是“逻辑的”戏法。

（2）克利盖用下面非逻辑的“戏法”来表达“每一个人单独生活”（简直是废话）的论点：“现在整个人类只是体现在个体中。”

（3）“事物现状的终止”必然取决于“人类创造精神的意旨”（这种精神根本就不存在）。

（4）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这样的：“他身上带有人类的烙印（现在对谁不能这样说呢？）[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按照人类的目标来确定自己的目标（似乎人类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目标的人！）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并且只是为了有可能将目前和未来的他全部献给人类，才力图完全成为他自己”（在一种虚幻的怪影面前的完全自我牺牲和自卑自贱）。

（5）对个人跟人类的关系问题也是用下面的夸张的蠢话来表达的：“我们大家就如同我们个人的活动一样，只是人类内部深处所发生的伟大运动的征兆。”“人类内部深处”，这究竟是哪呢？这样说来，具体的人只是虚幻世界“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征兆”和标记。

（6）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他使这种“伟大精神”“在圣餐杯中发出色彩奇异的光辉”并象“圣灵”一样“在教友眼中发光”。

既然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被这样变成“探求”圣灵和圣餐，当然，克利盖也可以说，“只需要认识”这种精神，就能“用爱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

(7) 在这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未做出以前,是把共产主义和圣餐[注:俏皮话:《Kommunismus》——“共产主义”,《Kommunion》——“圣餐”。——编者注。]混为一谈:“征服世界的精神,支配风暴和雷雨的精神(!!!!),治好盲人和麻疯病患者的精神,让世人同喝一种酒(我们要喝各种各样的酒)[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和同吃一块面包(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是更高的)[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的精神”,“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精神,就是共性精神”。如果这种精神确实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那就完全不能理解,按照克利盖的说法怎么来解释私有制的长期存在。的确,这种精神还没有被“认识”,所以它仅仅在克利盖个人的想象中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

由此可见,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对“共性的圣灵”的信念,这正是共产主义为求本身实现时最不需要的东西。

第四部分 向宗教谄媚

不言而喻,克利盖关于爱的高谈阔论和对利己主义的攻击,正是浸透了宗教思想的那种心情的大言不惭的表白。我们很快会看到,在欧洲经常冒充无神论者的克利盖如何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其结果必然是完全自甘堕落。

在第10号上登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和“海耳曼·克利盖致哈罗·哈林”等文章中,说,共产主义斗争的目的是:

(1)“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克利盖却没有发现,这些基督教的幻想只是现存世界虚幻的反映,因此它们的“现实性”已经表现在这一现存世界的丑恶的关系中。

(2)“为了这个爱的宗教,我们要求:饿的人有饭吃,渴的人有水喝,裸体的人有衣穿”。一千八百年来这种要求已经重复得令人厌烦然而毫无成就。

(3)“我们教会人们表现爱”,为了

(4)“领悟爱”。

(5)“在他们的爱的王国不可能有任何鬼怪”。

(6)“他的(人的)[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最神圣的要求就是完全把个人融在相爱者的社会中,对这些人他决不保留其他任何东西,除了

(7)他那无限的爱”。可以设想,在这种无限性中,爱的理论达到了最高点,似乎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高的东西了;然而事实上却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东西。

(8)“这种爱的热情的流露,舍己为人的决心,对共同体的神圣的渴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最隐蔽的宗教,这种宗教只是缺乏相应的外部世界借以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了”。但是,现在的“外部世界”显然是使克利盖完全有可能把他的“最隐蔽的宗教”、他的“神圣的渴望”、他的“舍己为人的决心”、他的“热情的流露”,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9)“难道我们就不能严肃地对待长期受抑制的宗教心的激动,不能为彻底实现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兄弟友爱的乐园而斗争吗?”于是克利盖就开始为严肃地对待心的激动而斗争,但这个心不是寻常的、卑鄙的,而是宗教的;这个心不是因现实的贫困而变得残酷的,而是充满幸福的幻想的心。他象牧师一样在这里替别人说话,就是说替“穷人”说话,来证明他的“宗教心”。因此他一开始斗争时,就向人表明,他本人并不需要共产主义,他之所以参加斗争只是由于他对“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宽宏大量的、自我牺牲的、含糊不清的忘我精神,因为这些人需要他去帮助。在孤寂和忧郁的时刻,这种崇高的情感就充满这位善良人的心,成为他消除万恶世界一切不幸的灵丹。

(10)克利盖在结束他那激动人心的冗长的演说时说:

“对于不支持这种政党的人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人类的敌人。”这种十分过激的词句似乎和“舍己为人的决心”以及对一切人的“爱的宗教”相矛盾。但它确是这种新宗教的完全必然的结论,因为新宗教和别的宗教一样,也极端仇视并迫害自己的敌人。政敌在这里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异教徒,因为实际存在的政党所反对的敌人已变成了对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人类”有罪的应受惩治的罪人。

(11)在给哈罗·哈林的信中说:“所有穷人都在玛门[注:财神之意。——译者注]的压迫下痛苦呻吟,我们号召他们起来反对玛门,当我们把可怕的暴君从他的古老的王座上推倒时,我们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教会人类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使早就预言的乐园终于来临。”为了对现在的金钱权力充满义愤,克利盖首先就得把金钱权力变成玛门偶像。这个偶像一定会被打倒,至于怎样打倒,那暂时还不知道。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缩小为单独的起义,打倒这个偶像以后,就会有预言家(“我们”)出现,为的是“教会”无产阶级以后该怎样做。这些预言家将“教会”当时很不了解本身利益的徒众,怎样“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而且并不是为了什么“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主要是为了实现圣书的预言,使一千八百年前一些空想家的预言不致落空。这种采取预言的作法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第8号上“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安得列阿斯·迪奇”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例子:

(a)“无产者,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

(b)“千万颗心愉快地跳动着去迎接实现誓言的伟大时代”,即“伟大的爱的王国……期待已久的爱的王国的来临”。

(c) 在第12号“答神甫的敌人科赫”中说：

“永恒救世的福音被人急速地口口相传”甚至“手手相递”。“急速传播福音”这种奇迹以及关于“永恒救世”的这种胡说，完全符合另一种奇迹，即古代传道师的早已遭到摈弃的预言却出乎意料地开始由克利盖实现了。

(12) 如果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答复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形象，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第8号“什么是无产阶级？”一文中。下面是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无产阶级，这就是人类。”简直是故意说谎，这样说来共产主义者倒似乎想消灭人类。“人类”这一答复不正象西哀士对“什么是第三等级？”¹⁴的答复吗？这一点正说明了，克利盖是用模糊不清的外壳来掩盖历史事实。克利盖马上又对美国抗租运动做了一番虚假的描述作为新的论据。“最后，如果这个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份”（他必需在一定的面具下出现；刚才还宣称无产阶级就是人类，而现在人类却变成无产阶级的一种身份了）“声明要求永远握有全部土地作为自己不可分割的财产又怎样呢？”我们看到，极简单的实际运动变成了象“人类”、“不可分割的财产”、“永恒性”等空洞的字眼，因此也就不会超出“要求”的范围。除了一般的形容词象“被压迫的”等等，还加上宗教的形容词“可诅咒的”。克利盖只是用一些神话和圣经中的形象来谈论无产阶级：

“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

“承担着人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

“永世徬徨的犹太人”。

结尾时他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难道人类应该永远象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在大地上徬徨吗？”可是这个“人类”中的一部分安居在大地上这件事却正是他的眼中钉！

(13) 克利盖宗教的本质极明显地反映在下面的话中：

“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应限于仅仅关心我们自己下贱的人格，我们是属于人类的。”对于脱离了“人格”并且与人格对立的“人类”（人类于是变成形而上学的臆想，而照克利盖的说法甚至变成宗教的臆想）的这种可耻的令人讨厌的奉承，这种真正极端“下贱的”奴隶般的自卑，就是克利盖的宗教以及其他任何宗教的结论。这种宣传卑谄求宠和轻视自己的学说，完全适用于勇敢的……僧侣，但永远不会适用于坚强的人们，特别是在斗争的时候。所差的只是使这些勇敢的僧侣阉割自己，去掉“下贱的人格”，以便使他们深信“人类”是能再生产自己的！如果说克利盖只能可怜地表现一下多情善感，想不出更好的东西，那末他在每号“人民论坛报”上反复搬弄他的“拉梅耐神父”，看来就是最机灵的做法了。

几乎每一号“人民论坛报”上都有那种乞求工作的话，这说明克利盖的无限怜悯和无限自我牺牲的宗教所引起的实际后果是什么，例如第8号上写道：

“工作！工作！工作！”

“在所有这些贤达的先生中，难道每一个人都认为供养忠诚的家庭并把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从穷困绝望中拯救出来，是徒劳无益的吗？例如，梅克伦堡人约翰·施泰恩到现在还没有工作，他愿意为资本家卖命，只要能够糊口就行了。难道这个要求在文明社会里是过分的吗？而巴登人卡尔·盖沙特勒呢？这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并且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看来十分忠诚善良，我保证他是忠诚的化身……此外，一位老年人和许多别的青年人也都在为谋生而恳求工作。凡是能帮助他们的人，请赶快帮助他们，否则有朝一日，当你们特别需要睡觉的时候，良心的谴责会使你们失眠的。诚然，你们可以说：成千上万的人都恳求工作，我们终不能帮助他们所有的人。噢，你们本来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们是利己主义的奴隶，你们毫无心肝，不愿意这样做。假如你们不愿意帮助所有的人，至少也得证明你们还有一点人类情感的残余。尽你们的所能帮助那些孤苦的人吧。”

噢，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能够超出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的！这就是实践方面，这就是新的宗教所宣扬的自卑自贱和自甘堕落的实际表现。

第五部分

克利盖个人的言论

克利盖在他的报刊上所发表的言论带有什么性质，从上面所引证的那些地方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谈几点。

克利盖作为一个预言家，因而也就必然作为埃萨伊¹⁵秘密同盟——“正义同盟”的代表发言。因此，既然他不是代表“被压迫者”发言，他就是为了“正义”发言，不过这种正义不是一般的正义，而是“正义同盟”的正义。他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也欺骗历史。他歪曲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的历史发展，其实他对于这种发展是一无所知的，他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这个埃萨伊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说般的阴谋。关于这一点每一号报纸上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答哈罗·哈林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同盟的威力的最荒唐的幻想。

克利盖作为一个真正的爱的使徒，他首先向妇女们呼吁，他并不认为她们卑劣到竟能抗拒充满爱的心，然后，他作为“儿子”，作为“兄弟”，作为“亲爱的兄弟”

“用温顺的字眼象儿子似地”向新出现的鼓动者们呼吁，最后他作为人又向财主呼吁。他刚到纽约，就写信给所有德国富商，用他那爱的纸炮吓唬他们，却不愿意过于露骨地承认他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有时用“人”，有时用“人们的朋友”，有时用“傻瓜”来署名。“我的朋友，你们相信吗？”对于他的丑角式的妄言没有人理睬。除了克利盖本人外，谁也不感到奇怪。他往往用“万岁！共性万岁！平等万岁！爱万岁！”一类的感叹词来装饰我们所熟悉的引证过的关于爱的词句（见第12号“答科赫”）。他把令人困惑的实际疑问和疑虑（见第14号“答孔策”）解释为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固执。

作为真正的预言家和爱的宣传者，他以仿佛受骗的纯洁心灵对嘲笑者、不信神的人和旧世界的人表现了极端疯狂的愤怒，就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了奇妙地变成“有福的天国居民”而求助于他的甜蜜的热爱。在第11号题为“春天”一文中，他怀着这种灰心而伤感的情绪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嘲笑我们，但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虔信宗教的人，要知道，春天就要来了！”

导师语录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不这样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